

## 「送窮」考

姜守誠\*

### 摘要

「送窮」是南北朝及唐代開始盛行的一種民俗活動，其含義就是將「窮鬼」送走、迎來富足生活，這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希望擺脫貧窮的美好願望。盡管歷代的「送窮」內涵大抵相同，但各地風俗之表現形式則多種多樣，「送窮」之日期也頗有差異，禁忌觀念各不相同。此外，部分地區民眾在「送窮」的同時，也流行「迎富」之舉。本文結合史料文獻，試對這兩種習俗的緣起背景、演變過程、祭祀日期及行為禁忌等內容，予以梳理和考證。

**關 鍵 詞：**送窮、迎富、窮鬼、《送窮文》、民俗禁忌

---

\* 姜守誠，哲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學術研究方向：道教文獻及道教史研究。2008 年 8 月-2009 年 7 月曾赴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先後在《成大歷史學報》、《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世界宗教學刊》等雜誌發表論文三十餘篇。

## 「送窮」考

姜守誠

- 一、「窮鬼」溯源
  - 二、「窮日」分歧
  - 三、「送窮」習俗
  - 四、「送窮」禁忌
  - 五、「迎富」釋義
  - 六、結論
- 

「送窮」，亦稱「送貧」、「送窮鬼」，意將窮氣、貧困驅趕出去，藉此祈盼家境富裕、條件改善。它蘊含了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同時作為歲時節俗而得以廣泛流傳。「送窮」觀念始見於漢代，而作為一種風俗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則始於南北朝及唐代，爾後迅速盛行於民間社會。

### 一、「窮鬼」溯源

「送窮」既然就是「送窮鬼」，那麼「窮鬼」緣何而來？其原型又係何人？翻檢文獻，我們發現「窮鬼」形象其實係出多元。

#### （一）窮子

相傳，「窮鬼」乃係顓頊(高陽氏)之子，亦名「窮子」。南朝梁人宗懷（約 501-565）撰《荊楚歲時記》載有「晦日送窮」條，隋代杜公瞻註曰：

按《金谷園記》<sup>1</sup>云：高陽氏子，瘦約，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與之，即裂破、以火燒穿著之，宮中號曰『窮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棄破衣，是日祀於巷，曰『送窮』。<sup>2</sup>

這段文字是說：顓頊帝(高陽氏)之子生來羸弱矮小，並且喜愛喝稀粥、穿破舊衣裳。送來新衣裳，會被牠扯破，再用火燒幾個洞，直到破爛不堪後才會穿上。所以，宮中人都稱之為「窮子」。這位「窮子」於正月三十日那天，死在巷子裏。此後，人們傳沿承襲在此日煮粥、丟棄破舊衣服，在巷子祭祀他，是為「送窮」。這條史料雖然採自傳說、略顯荒誕，卻反映了世人對「送窮」風俗起源的通俗化理解，同時也是有關「送窮」習俗起源的最早文獻資料。<sup>3</sup>

其後，南宋末陳元靚撰《歲時廣記》卷十三「除貧鬼」條和南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天時部〉「除貧鬼」條均引唐代《四時寶鑑》，所錄文字大略相同，皆云：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鬼』。韓文公《送窮文》，亦云：「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糧，三揖窮鬼而告之。」<sup>4</sup>

又據《歲時廣記》<sup>5</sup>卷十三「號窮子」條引《文宗備問》記載：

昔顓帝時，宮中生一子，性不著完衣，作新衣與之，即裂破，以火燒穿著，宮

<sup>1</sup> 《金谷園記》今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直齋書錄解題·職官類》、《文獻通考·經籍考》均著錄《金谷園記》一卷，李邕撰。唐代名士李邕（678-747），字泰和，廣陵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人，曾任北海太守，故又稱「李北海」。他能詩善文，尤長於碑頌。不過，我們尚無法判定唐代李邕《金谷園記》與前引《荊楚歲時記》註文中《金谷園記》是否為同一版本。

<sup>2</sup> 宗懷（南朝梁），《荊楚歲時記》，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589冊，史部三四七（地理類），總頁19。

<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鑑於《荊楚歲時記》反映的是古代楚地（今江漢平原一帶）歲時節令風俗，文中所言「晦日送窮」恐尚係地方（區域）性民俗活動，乃盛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而尚未北傳中原。「送窮」作為全國性習俗被廣大民眾所接受，則似始於唐代。

<sup>4</sup> 祝穆（南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5冊，子部二三一（類書類），總頁104。

<sup>5</sup> 現存《歲時廣記》計有二種版本：一種是四十二卷本（正文四十卷，首卷一卷，末卷一卷），係天一閣傳本；一種四卷本，係節錄四十二卷本中前四卷而成，《四庫全書》收錄此本。（有關《歲時廣記》版本之研究，詳見牛會娟，《〈歲時廣記〉版本考》，《中華文化論壇》，第2期，成都市：中華文化論壇雜誌社，2007，頁42-45）本文所引「送窮」文字，僅見於四十二卷本，而不見載於四卷本。

中號為「窮子」。其後以正月晦日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卻窮子也」。因此相承送之。<sup>6</sup>

上述關於「窮鬼（子）」身世之傳說，亦屢為明清之際文獻所援引。如明萬曆年間彭大翼（1552-1643）撰《山堂肆考》卷八〈時令〉收錄「除貧」和「送窮」條；<sup>7</sup>又如明人郎瑛（1487-1566）撰《七修續稿·辯證類》「送窮」條云：

《四時寶鑑》曰：高陽氏之子，好衣弊、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巷。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若寒食競渡之事，止此日耳。《猗覺寮記》以唐人正月下旬「送窮」，則又少訛矣。<sup>8</sup>

清人梁章鉅（1775-1849）撰《浪跡三談》卷三〈送窮日〉所載亦同。<sup>9</sup>

## （二）五鬼

唐代文豪韓愈（768-824）於憲宗元和六年春（811）撰〈送窮文〉言所欲送出之「窮鬼」乃係五鬼：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sup>10</sup>雖然，這番「五窮鬼」說法恐係出自韓氏臆造、帶有明顯的文人化詮釋和解說色彩，卻反映出時人將「窮鬼」定型為五鬼的傾向。四十八年後，晚唐小說家段成式（約 803-863）於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再作〈送窮文〉（又名〈送窮祝〉）亦沿襲了韓氏關於「五

<sup>6</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885 冊，史部·時令類，總頁 242；陳元靚（南宋），《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3，頁 135；劉喜海（清）跋抄本《歲時廣記》（四十二卷），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庫，書號：13186。

<sup>7</sup> 彭大翼（明），《山堂肆考》，卷 8，〈除貧〉條：「《四時寶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於是日，作糜粥、破衣棄於巷，祀曰『除貧鬼』。」又「送窮」條：「韓文公〈送窮文〉：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糗，三揖窮鬼而告之。云云。」（彭大翼（明），《山堂肆考》，卷 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74 冊，子部二八〇，類書類，總頁 129）。

<sup>8</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123 冊，子部·雜家類，總頁 363。

<sup>9</sup> 梁章鉅（清）撰《浪跡三談》，卷 3，〈送窮日〉：「《四時寶鑑》云：『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於巷，世作糜粥敝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竟如寒食競渡之事止於此日也。」（梁章鉅（清），《浪跡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3，陳鐵民點校，頁 456-457）。

<sup>10</sup> 韓愈（唐），〈送窮文〉，載氏著《韓昌黎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卷 36，頁 8-10；韓愈（唐），〈送窮文〉，載氏著《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8，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頁 570-572。

窮鬼」之說法。<sup>11</sup>此後，歷代文人不乏以「送窮」為題、吟詩作賦，他們大都承襲韓愈對「五窮鬼」的界定。

南宋名士洪邁（1123-1202）撰《容齋續筆》卷十五〈逐貧賦〉條云：「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sup>12</sup>南宋方大琮（1183-1247）撰《鐵庵集》卷十二〈上觀使衛大參〉云：「祇延座上五窮鬼，才學功力世所有者，咸無焉。」<sup>13</sup>金末元初詞人元好問（1190-1257）撰〈沁園春·除夕二首〉（之二）云：「再見新正，去歲逐貧，今年送窮。……面目堪憎，語言無味，五鬼行來此病同。齏鹽裏，似揚雄寂寞，韓愈龍鍾。」<sup>14</sup>由此可見，宋元士人筆下所言「窮鬼」均係指五鬼，且多沿襲了韓愈關於「五窮鬼」的詮釋內涵。

明清文人亦爭仿韓文創作「送窮」詩抑或「留窮」賦，或沿襲之，或譏諷之，卻同樣秉承了韓氏之遺意。如明代詩人謝榛（1495-1575）撰《四溟詩話》（卷四）云：「正月晦日，集晉川園亭，因韓退之、段成式曾於是日皆作《送窮文》，予賦《留窮詩》，以述其志云：『送窮何所往？託寓豈無由？……』。」<sup>15</sup>又，清代詩人蔣士銓（1725-1784）撰《忠雅堂文集》卷二十五〈題周令青在〈迎窮圖〉〉談道：「五窮咲別韓退之，不知主者復有誰？……開門拱揖罄折施，五君主我更勿疑。」<sup>16</sup>這裏「五君」即指「五窮鬼」。

### （三）窮女

其實，唐人對「窮鬼」的身份界定也不盡相同，如陳惟岳所繪〈送窮圖〉就將「窮鬼」定型為草束「窮女」形象（以示「送窮」之義），其旁襯托以木鏤「富

<sup>11</sup> 姚鉉（宋）編，《唐文粹》，卷33上，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3冊，集部二八二，總集類，總頁486。

<sup>12</sup> 洪邁（南宋），《容齋續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15，孔凡禮點校，頁408。

<sup>13</sup> 方大琮（南宋），《鐵庵集》，卷12，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8冊，集部一一七，別集類，總頁209。

<sup>14</sup> 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卷45，頁1061。

<sup>15</sup> 謝榛（明），《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卷4，頁126-127。

<sup>16</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37冊，集部·別集類，總頁101。

女」（以示「迎富」），二者皆為婦人之狀。遺憾的是，陳氏〈送窮圖〉今已亡佚不存，我們無緣睹見其真貌。不過，宋人董道（約 1079-1140）撰《廣川畫跋》卷三〈送窮圖〉對此畫作有詳細描述：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sup>17</sup>……其畫窮女，形露醜淒，作跼□態，束芻人立，曳薪船行，繩引□鞆，驅繫柂□，裏以纏繞，薦之醯醢。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為富女，作嫵媚象，裁槻為衣，鏤木為質，戴之舡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為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脩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攷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種種金銀、琉璃、玻瓈、真珠、珊瑚、虎珀、馬瑙，象馬車乘，所至富豐，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所有財寶，應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則持利刀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燒香，揮援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怨「功德天」者，即當恭敬「黑闇」。或人懼貧、願富，兩不得求，顛沛以出。復有貧人乃在貪富，並求住家，冀得幸彼，獲此除棄，無一日留資，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如屏去卷圖、謝客，愛欲不留，無所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sup>18</sup>

這段引文包含了幾層含義：第一、晚唐陳惟岳所繪〈送窮圖〉中有兩位婦人形象：一位是窮女，行跡猥瑣、步履蹣跚，係草束而成，肩引纜繩拖木船而行，人們均開門送走她，此係「送窮」。另一位是富女，婀娜多姿，衣著光鮮，鏤木而成，坐於舟船之上，配飾以纓絡。人們恭立門前迎接之，請她升堂就座、殷勤拜獻，此係「迎富」。第二、韓愈作文僅知「送窮」，而不知「迎富」，說明韓氏所處的唐代中期—貞元、長慶年間，尚無「迎富」之說（至少未形成廣泛影響）。第三、

<sup>17</sup> 陳惟岳，係晚唐僖宗時畫師。前述《廣川畫跋》文仲介紹《送窮圖》當作於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然查驗《中國歷史紀年表》可知，僖宗一朝並無「咸平」紀年，此為北宋真宗時年號。這段文字中出現紀年與朝代不符現象，其原因不外乎有二：或董道撰作《廣川畫跋》時偶有筆誤疏忽，或後人傳抄過程中出現訛誤。—感謝匿名審稿人提示。

<sup>18</sup> 董道（宋），《廣川畫跋》，卷 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 冊，子部一一九，藝術類，總頁 467-468。

韓愈並未考證「送窮」之由來，這一典故其實源出佛典，窮女、富女本係姊妹，窮女名「黑闇」，富女名「功德」。「功德」擁有各種珍寶，可使人致富，故人們爭相追逐禮敬之；「黑闇」則會讓人耗盡財富、陷入貧窮，故人們紛紛送走她，不願她片刻停留。第四、世人因不明了貧富相依的道理，所以多嫌貧愛富，恕不知安貧樂道、摒棄非分之念，才是最重要的。今人錢鍾書《管錐編》承襲此說，並指出「功德大天」與「黑闇」之典故出自《大般涅槃經·聖行品》第七之二。<sup>19</sup>

送窮女、迎富女，此說一直流傳於後世。元好問撰《遺山集》卷十二〈送窮〉（其一）<sup>20</sup>七言絕句云：「煎餅虛拋壘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不如留取窮新婦，貴女何曾喚得來。」<sup>21</sup>這裏所言「窮新婦」和「貴女」，當指陳惟岳〈送窮圖〉中的窮女「黑闇」和富女「功德」。明清各地民眾多流行「送窮」風俗，不過扮作窮女、富女的婦人偶像之質地已由草束、鏤木而改為剪紙。如清代詩人彭兆蓀（1769-1821）《小謨觴館詩集》卷一〈樓煩風土詞六首〉（之二）云：「剪紈劈紙傲嬋娟，略比奴星送路邊。富媳娶歸窮媳去，大家如願過新年。」<sup>22</sup>這首七律詩是說：新年到來之際，家家戶戶剪紙為婦人形，將其丟棄到路邊。藉此代表送走窮媳婦、迎進富媳婦，皆大歡喜過新年。（更多案例詳見下文）當然，有些地域仍保留了束草為偶人的傳統（詳見同治本《瑞州府志》）。此外，某些方志材料中僅籠統地說「剪紙為人」或「束芻像人」、「束紙為人」（詳見下文），並未言明是何性別，但據推斷當係婦人為是。

#### （四）窮神

宋代閩粵等地民眾礙於忌諱和畏懼，或不言「窮鬼」而尊稱為「窮神」。南宋洪邁撰《夷堅志·補》卷十五「南安窮神」條載：

<sup>19</sup>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第3冊，頁956-964。

<sup>20</sup> 元好問（金）《遺山集》收錄了以「送窮」冠名之詩文共計三首：一首見於卷11，二首見於卷12。

<sup>21</sup> 元好問（金），《遺山集》，卷12，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1冊，集部一三〇，別集類，總頁135；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12，頁291。

<sup>22</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集部·別集類，總頁530。

張子韶謫居南安，多蔬食，間遇一肉，必薦家廟。一日，將享客，作蒸羊，戒庖人必修潔，遂去故釜，創於庭木之陰。薪火既然，芳香暢達，望庖人舉手加額，若有禱然。須臾，鼎作聲，有巨鷹從空俯首一鳴，鼎汁四溢，流注於地，肉皆狼藉。羣鷹翻飛上下，攫搏不已，其狀猛怪。庖人有怒色，囁嚅誚罵，就扣之，乃云：「此地有窮神，適因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也。」張笑曰：「俚諺鄙陋者為窮鬼，今乃有窮神耶！」嶺下風俗逼於蠻貊，故神怪如此。<sup>23</sup>

南安（今屬福建），宋時稱南安軍，地處閩粵交界、是古時中原與嶺南銜接的交通樞紐。據前述引文可知，南宋時南安一帶鄉土民眾已開始將「窮鬼」徑稱為「窮神」，不過看來此說尚未被士人階層（尤其是北方人）所接受。明清之際，「窮神」這一稱謂逐漸在社會各階層中流傳開來。如清代著名志怪小說家蒲松齡（1640-1715）所撰〈除日祭窮神文〉、〈窮神答文〉均以「窮神」言事。<sup>24</sup>

## 二、「窮日」分歧

有關「送窮」之日，唐代以降文獻典籍中存見分歧，大致歸納為如下幾種情況：

### （一）正月晦日

古人素忌晦日，而正月晦日（三十日）作為新歲首例尤為世人所重，乃至南北朝時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民俗節日（「晦日節」）而見載史籍。如南朝梁人宗懷《荊楚歲時記》載：「元日至於月晦，並為酣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sup>25</sup>這反映了南朝時人每年慣例於正月晦日擇水邊聚飲，或泛舟或宴樂。其實，此風俗同樣盛行於北朝地區，魏齊時盧元明、魏收分別有詩〈晦日泛舟應詔〉即為例

<sup>23</sup> 洪邁（南宋），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補卷15，頁1694。

<sup>24</sup> 蒲松齡（清），《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路大荒整理，頁1753-1754。

<sup>25</sup> 宗懷（南朝梁），《荊楚歲時記》，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史部三四七，地理類，總頁19。



證。晦日節，在唐朝更一度被列為國家性的慶典節日。<sup>26</sup>唐德宗貞元四年(788)九月詔說：「今方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官僚選勝地追賞為樂。」<sup>27</sup>有唐一代，文人墨客留下有關「晦日節」的大量詩文。其中，「送窮」則是「晦日節」風俗的重要內容之一。<sup>28</sup>據《荊楚歲時記》「晦日送窮」條之標題就表明「送窮」之日乃係正月晦日。而後世廣為徵引的唐代《四時寶鑑》中明言高陽氏子（「窮子」）死於「正月晦日」，世人擇此日祭祀「窮子」、乃至演變為「送窮」習俗也合乎情理。

唐代韓愈撰〈送窮文〉開篇即點明「送窮」之日為正月晦日；<sup>29</sup>晚唐段成式續作〈送窮文〉亦云正月晦日送窮船。此外，唐代詩人姚合（779-846）撰有〈晦日送窮三首〉<sup>30</sup>、唐代詩人李郢所撰〈正月晦日書事〉<sup>31</sup>，均明確談到「送窮」乃於正月晦日時舉行。

唐代之後，正月晦日「送窮」風俗亦為宋元時人所承襲。如陳元靚撰《歲時廣記》卷十三「送窮鬼」條引宋人楊湜撰《古今詞話》<sup>32</sup>云：

太學有士人長於滑稽，正月晦日，以芭蕉船送窮作《臨江仙》，極有理致。……

予幼時亦聞巴談《送窮鬼》詞曰：「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

輝，內裏更有筵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吃莫形跡。每年只有今日日，願我

<sup>26</sup> 夏日新，〈正月晦日節考〉，《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期（湖北：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2005），頁133-136。

<sup>27</sup>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3，〈德宗本紀下〉，頁366。

<sup>28</sup> 正月晦日節，於唐德宗時李泌奏請廢止。明代謝肇淛（1567-1624）撰《五雜俎》（又名《五雜俎》），卷2，〈天部二〉記載：「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為窮日，寒食禁煙，以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謝肇淛（明），《五雜俎》，上海：中華書局，1959，卷2，頁31-32）。

<sup>29</sup> 韓愈〈送窮文〉云：「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糧；牛繫軛下，引帆上牆；三揖窮鬼而告之曰……。」（韓愈（唐），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送窮文〉，載氏著《韓昌黎文集校注》，卷8，頁570）。

<sup>30</sup> 姚合（唐），《姚少鑒詩集》，卷6，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1冊，集部二〇，別集類，總頁729；劉衍，《姚合詩集校考》（長沙：嶽麓書社，1997），卷6，頁85。

<sup>31</sup> 蒲積中（宋）編，《歲時雜詠》卷9，載（清）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8冊，集部二八七，總集類，總頁279。

<sup>32</sup> 中國古代詞學史上共計有三種《古今詞話》版本，分別是：第一、南宋楊湜撰《古今詞話》，久已亡佚，今有趙萬里輯本和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輯本；第二、清初沈雄撰《古今詞話》八卷；第三種《古今詞話》作者不詳，曾為沈雄《古今詞話》和清初《歷代詞話》中徵引。

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sup>33</sup>

這首詩中援引宋人巴談所撰〈送窮鬼〉，曾有學者據此認為文中「郎君、小娘子」是指『窮鬼』，故「而『窮鬼』顯為一男一女，恐從『灶公灶母』而來」。<sup>34</sup>筆者認為此說非是，翻檢歷代文獻並無「窮鬼」為一男、一女之說法。這兩位偶人當係扮演了「送窮船」上船伕的角色（或係船神—唐代人稱為「孟公、孟姥」<sup>35</sup>），其實詩中也明確說道：請他們飽食後趕快搖船、送走「窮鬼」——「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總之，兩宋文人沿襲了唐代舊俗，仍擇正月晦日的傍晚施予「送窮」。這與唐代李郢〈正月晦日書事〉詩中所言「鹽米妻兒夜送窮」之句相互印證。

爾後，清代康熙時人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引《廣東志書》「廣州府」條載：「（正月）晦日掃除，謂『送窮』。」<sup>36</sup>由此可見，清初廣州民眾仍以正月晦日「送窮」。

必須指出的是，唐代的「送窮」日，不乏可見僅含糊地說「正月下旬」之情況者，如南宋朱翌（1097-1167）撰《猗覺寮雜記》（卷上）云：「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sup>37</sup>明代張岱（1597-1679）撰《夜航船》卷一〈天文部·春〉「卯剛」條云：「正月卯日，佩卯剛辟邪。唐制：正月下旬送窮，晦日湔裳。」<sup>38</sup>

<sup>33</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85冊，史部·時令類，總頁242-243；陳元靚（南宋），《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3，頁135-136；清代劉喜海跋抄本《歲時廣記》（42卷），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庫，書號：13186。這段文字，亦為清人俞樾撰《茶香室三鈔》卷1「正月晦送窮故事」條中援引。（俞樾（清），《茶香室三鈔》，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9，卷1，頁1100。）

<sup>34</sup> 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攤、祀灶風俗〉，《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廣州市：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1993），頁110-116。

<sup>35</sup> 唐代段公路撰《北戶錄》，卷2「雞骨卜」條云：「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傳古法也。卜吉即以肉祠船神，呼為『孟公、孟姥』，其來尚矣。按：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姥』。劉思貞云：玄冥為水官，死為水神，冥、孟聲相似。又，孟公，父名幘，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名履。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段公路（唐），《北戶錄》，卷2，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史部三四七，地理類，總頁45）。

<sup>36</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5），第3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15卷，〈孟春部〉，頁1890。

<sup>37</sup> 朱翌（南宋），《猗覺寮雜記》，卷上，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0冊，子部一五六，雜家類，總頁448。

<sup>38</sup> 張岱（明）綴輯，《夜航船》（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2），卷1，頁23。

## (二) 正月廿九

正月廿九(二十九)日,又稱「窮九」、「窳九」。于省吾撰《甲骨文字釋林》(上卷)「釋寢」條中已指出:「九與鬼聲近通用」,<sup>39</sup>故世人所稱「窮九」實為「窮鬼」之含義。宋代開始就有部分地區的民眾選擇於正月廿九日「送窮」。如北宋末葉廷珪撰《海錄碎事》卷四上「窮九」條云:「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sup>40</sup>這段引文是說,宋代池陽地區(今屬安徽池陽境內)民眾以農曆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這天,各家均清掃家宅居室,並將灰塵污垢投入水中,世人稱之「送窮」。宋人喻良能(1120-?)撰〈二月二日大雪〉詩曰:「磬湖二月雪,寒氣故裴回。麵市連天合,銀花照眼開。送窮窮不去,招隱隱難來。幸有麵生在,何妨畧恥疊。」<sup>41</sup>其中,喻氏自註「送窮窮不去」之句時說道:「俗以正月二十九日送窮,二月二日為迎富。」<sup>42</sup>喻良能,係婺州義烏(今屬浙江)人。此外,宋末元初俞德鄰(?-1293)撰〈斥窮賦〉亦談道:「歲在執徐,月旅太簇,辛亥御日,陽風應候。俞子刈荊,掃室,剪蕉,載糗,委敝裘於道傍,揖窮鬼而三呪」云云。<sup>43</sup>文中所謂「歲在執徐」即指紀年地支為「辰」,<sup>44</sup>「月旅太簇」乃指建寅之月—正月。<sup>45</sup>查驗曆書並試予推算,<sup>46</sup>筆者認為這裏所言「歲在執徐,月旅太簇,辛亥御日」當指南宋度宗咸淳四年歲次戊辰,

<sup>39</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2009),上卷,頁70。

<sup>40</sup> 葉廷珪(北宋),《海錄碎事》(台北:新興書局,1969),卷4上,頁409。南宋陳元靚撰《歲時廣記》卷13「除貧鬼」條引《圖經》所云,與此段文字相同。(詳見《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85冊,史部·時令類,總頁242)。

<sup>41</sup> 喻良能(宋),《香山集》,卷6,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1冊,集部九〇,別集類,總頁676。

<sup>42</sup> 喻良能(清),《香山集》,卷6,總頁676。

<sup>43</sup> 俞德鄰(宋末元初),《佩韋齋集》,卷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集部一二八,別集類,總頁57。

<sup>44</sup> 《爾雅·釋天》曰:「(太歲)在辰曰執徐」。(徐朝華注,《爾雅今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頁201)。

<sup>45</sup> 南梁陸佐公撰〈石闕銘〉曰:「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唐代李善對此句註云:「《漢書》曰:太簇位在寅,正月也。」(蕭統(梁)編、李善(唐)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56,《銘》,頁2421)。

<sup>46</sup> 有關推算曆日之工具書,計有: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王雙懷主編,《中華日曆通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第3冊。

甲寅月辛亥日，即農曆正月二十九日。俞德鄰，乃係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喻良能和俞德鄰，二人所處時代相距不遠，且籍貫和活動地域同屬今浙江一帶。故而，前引二文可互為資證。據此可知，兩宋之季，除安徽池陽外，浙江的溫州、婺州等地也流行正月二十九日「送窮」習俗。

此外，明代閩地民眾也將正月二十九日視為「竊九」而「送窮」。如明人謝肇淛（1567-1624）撰《五雜俎》（又名《五雜組》）卷二〈天部〉：

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竊九」，謂是日天氣常竊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舖之。……又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為「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余謂俗說不足信。竊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獨言正月者，舉其端也。<sup>47</sup>

謝氏係福建長樂人，熟知閩中一帶風俗。他記述了當地人將正月二十九日稱為「竊九」，值此以糖和棗等物煮粥來喝。清人施鴻保（？-1871）撰《閩雜記》卷一「竊九」條也證實了此說法，如謂：「福州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竊九』，人家皆以諸果煮粥相饋，如吾鄉十二月初八僧尼所送之臘八粥。……第府志但作『竊九』，竊字俗讀拗，亦有作『拗九』者。」<sup>48</sup>

有趣的是，明代徐應秋（生卒年不詳）撰《玉芝堂談薈》分別援引明人陳耀文（1573-1619）編《天中記》（卷四）<sup>49</sup>和唐代《四時寶鑒》二書中涉及「送窮」的記載，將正月廿九視作「送窮」日，正月晦日則稱「送窮鬼」，如此一來就將原本一個節日拆分開來，極易令人誤解。如該書（卷二十一）云：「又池陽，正月廿九，謂之『窮九』。掃屋室，塵穢投水中，謂之『送窮』。（見《天中記》）正月晦日，衣敝食糜，是日記於巷，曰『送窮鬼』。（見《四時寶鑑》）」<sup>50</sup>事實上，這充分

<sup>47</sup> 謝肇淛（明），《五雜俎》（上海：中華書局，1959），卷2，頁30-31。

<sup>48</sup> 施鴻保（清），來新夏校點，《閩雜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卷1，頁14。民國版《連江縣志》，卷19〈禮俗〉：「（正月）二十九日，以芋、菽、花生、飴果和米作糜，名為『拗九粥』。是夕，人家重張燈火，俗呼『饒〔留〕燈』。」（邱景雍纂修，鄭開渾點校整理，《民國版連江縣志》，連江縣人民政府，1989，卷19，頁318。

<sup>49</sup> 明代陳耀文撰《天中記》，卷4「窮九」條云：「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陳耀文（明），《天中記》，卷4，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65冊，子部二七一，類書類，總頁177）。

<sup>50</sup> 徐應秋（明），《玉芝堂談薈》，卷21，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3

體現出了「送窮日」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即由唐代正月晦日，衍生出宋明之季的正月廿九日。

### （三）正月初六

北宋末金盈之（約 1126 前後在世）撰《醉翁談錄》卷三〈京城風俗記〉記載：

（人日）前一日（守誠按：即正月初六），探聚糞壤，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韓文公〈送窮文〉尚矣。又石曼卿〈送窮〉詩曰：「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

51

金氏《京城風俗記》抄錄了他人所記北宋東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的一些風俗人情。這段文字乃承襲自北宋呂原明撰《歲時雜記》，<sup>52</sup>真實再現了當時民眾「送窮」之場景：「人日」（正月初七）的前一天（即初六日）清掃塵埃，將「糞壤」（即垃圾）收攏起來，以七枚煎餅覆蓋其上，趁沒人時將它們丟拋到大路上，謂之「送窮」。

正月初六「送窮」之風俗，似不顯於後世，故晚清名士俞樾(1821-1907)撰《茶香室三鈔》卷一「正月六日送窮」條中援引上述《歲時雜記》文字後，略加評論說：「按：人知正月晦日，有送窮之事；不知人日前一日，亦有之也。」<sup>53</sup>可見，清朝士人已多不知舊時曾有正月初六「送窮」之事了。

---

冊，子部一八九，雜家類，總頁 498。

<sup>51</sup> 金盈之（北宋），周曉薇校點，《新編醉翁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卷 3，頁 10。

<sup>52</sup> 陳元靚（南宋）撰，《歲時廣記》，卷 9「送窮鬼」條引宋呂原明《歲時雜記》：「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石曼卿〈送窮詩〉云：『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885 冊，史部·時令類，總頁 211）這段文字，亦為清人俞樾《茶香室三鈔》卷 1「正月六日送窮」條中援引（俞樾（清），《茶香室三鈔》卷 1，頁 1099）。

<sup>53</sup> 俞樾（清），《茶香室三鈔》，卷 1，頁 1099。

#### (四) 除夕

「送窮」之日雖然分歧頗多，但大凡多擇新年伊始的正月某日。盡管如此，文獻記載中卻不乏可見舊年臘月末「送窮」之案例。其中，除夕日「送窮」是值得注意的歲時風俗。北宋詩人王令(1032-1059)於仁宗皇佑四年(1052)撰〈送窮文〉云：「維皇祐壬辰十二月三十日，謹奉香酒，送窮鬼而告之曰：……今月晦日，傳子欲行，有酌斯清，有焚斯馨，揖行頌禱，期爾之行」云云。<sup>54</sup>此文雖係仿效韓愈而作，但「送窮」之日卻差異明顯：韓愈〈送窮文〉所言「送窮日」乃係新年的正月晦日，而王令所言「今月晦日」卻是十二月三十日，即舊年末臘月除夕日。此或係遷就江淮一帶民俗，抑未可知。南宋愛國詩人陸遊(1125-1210)作〈門外野望〉五言詩曰：「僧唄家禳疫，神船社送窮。豐年隨處樂，忘卻鬢如蓬。」<sup>55</sup>詩文標題下原署「十二月二十五日」字樣，今人錢仲聯先生考訂「此詩嘉泰元年冬作於山陰」<sup>56</sup>。越州山陰(今屬浙江紹興)，是陸遊的籍貫地和長期生活之地。若據詩文內容分析，或不排除當地民眾乃於歲終臘月時「送窮」。

元代文人以「除夕」為題材創作了大量詩文，其中頻涉「送窮」之事。譬如，隸屬於正一道玄教的黃冠詩人馬臻(生卒年不詳)撰《霞外詩集》卷二〈除夜〉云：「竹爆聲殘燈燼垂，坐聽更漏隔年期。喜神宜向迎須早，窮鬼難驅去任遲。」<sup>57</sup>元人胡助(生卒年不詳)撰《純白齋類稿》卷四〈除夕〉：「翩翩江南客，復此遇除夕。……爆竹聲轟轟，窮鬼驚辟易。」<sup>58</sup>又卷十〈除夕偶成〉：「節物紛華除夕至，嗟余幾見客京城。……紫陌糟兵連夜飲，朱門爆竹半空鳴。歲寒固守清貧樂，窮鬼年年送不行。」<sup>59</sup>元代茅山派道士張雨<sup>60</sup>所撰《句曲外史集》卷上〈除夜〉曰：「忽

<sup>54</sup> 王令(北宋)，〈送窮文〉，載氏著《王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19，頁338。

<sup>55</sup> 陸遊(南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49，頁2973。

<sup>56</sup> 陸遊(南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卷49，頁2973。

<sup>57</sup> 馬臻(元)，《霞外詩集》，卷2，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集部一四三，別集部，總頁79。

<sup>58</sup> 胡助(元)，《純白齋類稿》，卷4，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4冊，集部一五三，別集類，總頁572。

<sup>59</sup> 胡助(元)，《純白齋類稿》，卷10，總頁611。

<sup>60</sup> 有關張雨的生卒年考證，詳見丁雪艷，〈關於張雨生卒年及其句曲外史之得名問題〉，《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4期(廣西：欽州學院，2004)，頁28-31。

忽歲雲暮，徒興白首嗟。……自緣身懶惰，莫遣送窮車。」<sup>61</sup>上述四首詩文標題即暗示了當時「送窮」乃係於除夕之夜。

明代「除夕」詩文中也不乏可見「送窮」辭句。譬如，張寧所撰〈戊子除夕〉詩云：「送窮漫學車船戲，逐疫新翻傀儡裝。最喜家門盡強健，綵衣稱慶醉椒觴。」<sup>62</sup>明代陶宗儀（1329-約 1412）撰〈除夜次韻〉詩文曰：「驅儺隊列糝盆艷，爆竹聲揚玉漏清。糗糒車船窮鬼事，杯盤燈火異鄉情。」<sup>63</sup>李曄（1314-1381）撰〈除夕〉詩云：「自喜新正近，誰憐暮景斜。題詩逐窮鬼，無用柳為車。」<sup>64</sup>上述詩文反映出「送窮」乃係在除夕之時。

其實，除夕「送窮」之舉業已化為年終守歲習俗的一部分，而得以延續到了清代及民國時期。如清人蒲松齡所撰〈除日祭窮神文〉中即言在除夕日祭祀「窮神」，如謂：「窮神，窮神，我與你有何親，興騰騰的門兒你不去尋，偏把我的門兒進？……今日一年盡，明朝是新春，化紙錢，燒金銀，奠酒漿，把香焚，我央你離了我的門，不怪你棄舊迎新。」<sup>65</sup>此外，清末民國時人胡樸安（1878-1947）撰《洛陽風俗瑣錄》中亦談及河南洛陽民眾「臘月三十送窮鬼，與南方送更飯相同。」<sup>66</sup>

## （五）正月初五

正月初五，又稱「破五」，部分地區民眾或擇此日「送窮」。翻檢文獻可知，此當始於宋代。如南宋王之望（1102-1170）撰〈留窮文〉開篇即言：

<sup>61</sup> 張雨（元），《句曲外史集》，卷上，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6 冊，集部一五五，別集類，總頁 365。這首詩亦題作〈歲暮〉，收錄於元代文學家顧瑛（1310-1369 年）輯《草堂雅集》卷七。（顧瑛（元）輯，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草堂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中，頁 594）。

<sup>62</sup> 張寧（明），《方洲集》，卷 9，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7 冊，集部一八六，別集類，總頁 301。

<sup>63</sup> 陶宗儀（明），《南邨詩集》，卷 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1 冊，集部一七〇，別集類，總頁 612。

<sup>64</sup> 李曄（明），《草閣詩集》，卷 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2 冊，集部一七一，別集類，總頁 29。

<sup>65</sup> 蒲松齡（清），《蒲松齡集》，路大荒整理，頁 1753。

<sup>66</sup> 胡樸安編著，《中華全國風俗志·河南·洛陽風俗瑣錄》（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頁 427。

癸丑之孟春五日壬子，晨起倦而假寐，見五怪物歛然俱至，衣裳藍縷，容色枯悴，聳肩拳脊，反耳昂鼻，行步傴僂，僅有聲氣，咿嚶而言，意若忿戾，曰：「我乃子之窮鬼，吾與子遊今三十年。」<sup>67</sup>

文中「孟春」即指正月，「孟春五日」為正月初五。由此可見，宋人已將正月初五視為「送窮」之日。又據明人韓邦靖（1488-1523）撰《朝邑縣志》卷一〈風俗〉云：「（正月）五日以故綵紙為婦人，戌夜乃出婦人送窮。」<sup>68</sup>由此可知：至遲明代開始，朝邑縣（今屬陝西渭南市大荔縣）民眾就盛行於正月初五剪紙為婦人狀，擇黎明時分送出、以示「送窮」。<sup>69</sup>

爾後，清代民眾「送窮」也擇於正月初五。據康熙五十六年刻本《解州志》記載：「正月五日，縛紙婦人，寅夜出之街衢，曰『送窮』。……但送窮，古以晦日，今用五日，稍異。」<sup>70</sup>這段方志材料證實了清初解州（今屬山西運城市）民眾乃於正月初五寅時（即清晨時分）「送窮」，同時談到此係由舊制的正月晦日改訂而來。

清代詩人彭兆蓀撰〈樓煩風土詞六首〉之二（詩文見前引）文末自註云：「正月五日，剪紙為婦人，棄路衢，曰『送窮』。行者拾歸，置牢廐間供奉，曰『送窮媳婦去、娶富媳婦歸』。」<sup>71</sup>這段註文與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大同府志》所載頗為相似（詳見下文）。此外，雍正年間纂修的《陝西通志》卷四五〈風俗〉引《臨潼縣志》、道光本《咸陽縣志》、同治本《河曲縣志》等清代方志中均談到正月初五「送窮」。

進入民國時期，正月初五「送窮」的習俗在部分地區仍得以延續。如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中部縣志》記載：「（正月）五日未明，束紙為人、舟車、

<sup>67</sup> 王之望（南宋），《漢濱集》，卷16，〈祭文〉，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9冊，集部七八，別集類，總頁885。

<sup>68</sup> 韓邦靖（明），《朝邑縣志》，卷1，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4冊，史部二五二，地理類，總頁52。

<sup>69</sup> 韓邦靖（明），《朝邑縣志》，卷1，總頁52。

<sup>70</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頁688-689。

<sup>71</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集部·別集類，總頁530。



糗餌，送之通衢，謂之『送窮』。」<sup>72</sup>中部縣，即今陝西黃陵縣。與之相距不遠的南鄭縣（今屬陝西漢中市）民眾也恪守於正月初五清掃院落、將灰塵和爐渣等物棄之路邊。（詳見民國刻本《續修南鄭縣志》）此外，民國二十三年（1934）石印本《偃師縣風土志略》亦云：當地人每年正月初五（俗稱「破五」）例行「送窮」。（詳見下文）

### （六）正月初三

清代及民國時期，江西、廣東、湖北等地民眾或以正月初三為送窮日。清代蘇州文士顧祿（生卒年不詳）撰《清嘉錄》卷一「小年朝」條援引《遠平志》云：「正月三日，人多掃積塵於箕，並加敝帚，委諸歧路以送窮。」<sup>73</sup>《古今圖書集成》引《江西志書》「萬載縣」條記載：萬載縣（今屬江西宜春市）民眾於正月初三晚「送窮」。又，清康熙二年修纂刻本《乳源縣志》（卷八）亦云：「正月初三日，打掃門庭以『送窮鬼』。」（詳見下文）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瑞州府志》（卷二）：「（正月）三日侵（清）晨，束芻像人，以爆竹、鑼鼓歡噪逐鬼，送至河邊，曰『送窮』，即古儺遺意也。」<sup>74</sup>民國十五年（1926）刻本《赤溪縣志》（卷一）云：「初三日送窮鬼。自『除夕』至初三日始掃地，婦早起掃除，攜香紙送於路旁，謂之『送窮鬼』。是日男女不出門，恐遇窮鬼，亦俗之迷惑者也。」<sup>75</sup>概括而言，從除夕到正月初二，這三天內不允許在家掃除，直到初三清晨方可清掃宅舍門庭，並將舊掃帚覆蓋於垃圾上，由婦人提攜紙錢、供品，傾倒於路邊（或岔路口）。這一做法，至今仍為部分農村地區所保留。

<sup>72</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頁136。

<sup>73</sup> 顧祿（清），王邁點校，《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1，頁20。清人袁景瀾編撰《吳郡歲華紀麗》卷1「小年朝」條亦云：「初三日為小年朝。……仍燒松明火於圍爐中，掃積塵於箕，加敝帚，委諸歧路以送窮。」（袁景瀾（清），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卷1，頁23）。

<sup>74</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5），頁1104。如清代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引《江西志書》「瑞州府」條亦記載當地民眾於正月初三日「送窮」。（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三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15卷，〈孟春部〉，頁1889。）

<sup>75</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頁818。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崇陽縣（今屬湖北咸寧市）民眾將正月初三稱為「送祖日」而進行祭祀。《古今圖書集成》引《湖廣志書》「崇陽縣」條記載：「正月三日，俗謂『送祖日』。各焚其門錢，開市交易，士大夫家或有至上元者。」<sup>76</sup>據引文所述，我們推斷此俗似不排除係由「送窮日」演化而來的。

### （七）上元節（正月十五日）

除上述「送窮」日外，還有一些特殊或罕見的時日。譬如，清代獲嘉縣（今屬河南新鄉市）民眾選擇上元節（正月十五日）那天舉行「送窮」儀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獲嘉縣志》記載：「『上元』……喧鼓樂於中庭，曰『趁鬼』，或作紙船，以酒酌之，投水中任其漂泊，曰『送窮船』。」<sup>77</sup>

## 三、「送窮」習俗

有些學者依據「窮鬼」身世之傳說，認為「送窮」習俗最早起源於上古顓頊時。如南宋哲學家黃震（1213-1281）撰《黃氏日抄》卷五九〈讀文集〉中認為：「送窮事，始顓頊高辛時。祖揚雄，有〈逐貧賦〉。」<sup>78</sup>「窮鬼」為高陽氏子，此說乃出杜撰、不足為憑。西漢揚雄（西元前 53-西元 18）所撰〈逐貧賦〉雖然已有「逐貧」、「送窮」之義，<sup>79</sup>然僅限於個體行為，尚未形成公眾性風俗、恐非「送窮」之始。<sup>80</sup>南朝宗懔《荊楚歲時記》中所記荊楚一帶「晦日送窮」，可見此時部分

<sup>76</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孟春部〉，頁 1889。

<sup>77</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頁 62。

<sup>78</sup> 黃震（南宋），《黃氏日抄》，卷 59，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8 冊，子部一四，儒家類，總頁 482。

<sup>79</sup> 揚雄（漢），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146-147；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11-212。

<sup>80</sup> 有學者指出西漢焦延壽《焦氏易林》中凡見有七次「貧鬼」之語，據此認為漢代已有「除貧」風俗。（詳見馬宗昌、張淑玉，〈揚雄〈驅貧賦〉與漢代民俗〉，《昭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3 期，雲南：昭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編輯部，2006，頁 17-20）。

地區業已形成「送窮」風俗。不過，「送窮」之風的廣泛盛行當始於唐代，<sup>81</sup>此後連綿不絕於宋元、明清及民國時期。下面，我們著重探討有關「送窮」的風俗習慣。

### （一）作糜、棄破衣祀於巷

杜公瞻註釋《荊楚歲時記》「晦日送窮」條時引《金谷園記》云：「今人作糜、棄破衣，是日祀於巷，曰送窮。」由此可見，「送窮」風俗興起之初，民眾僅以糜粥和破衣在自家巷子裏進行簡單地祭祀。而這兩種祭品，恰為「窮鬼」所喜好——文中談到窮子「好衣敝、食糜」，故而民眾投其所好、以之為薦。

此外，元初俞德鄰撰〈斥窮賦〉亦言：「俞子刈荊，掃室，剪蕉，載糗，委敝裘於道傍，揖窮鬼而三呪」云云。<sup>82</sup>這段引文介紹了以乾糧和「敝裘」（破衣襤衫），在道旁祭送「窮鬼」。更有甚者，清末咸陽縣民眾則以「破衣」和「殘飯」施予祭拜，如道光十六年重刻本《咸陽縣志》記載：「（正月）五日，剪紙人破衣，以殘飯置僻處，曰『送窮』。」<sup>83</sup>這裏不僅有「破衣」，而且將「糜粥」也換成了殘羹冷炙，看似像打發叫花子。這番祭祀確實夠寒碇的了。

### （二）結柳作車、縛草為船

「送窮」之風的漸趨奢華，可追溯於唐代韓愈〈送窮文〉所言「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如謂：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粳；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粳。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

<sup>81</sup> 劉桂秋，〈唐代的「送窮」習俗〉，《文史知識》，第12期（北京市：中華，1988），頁43-45。

<sup>82</sup> 俞德鄰（宋末元初），《佩韋齋集》，卷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集部一二八，別集類，總頁57。

<sup>83</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頁11。

文中所言憲宗「元和六年」即西元 811 年，韓愈時年 45 歲、任河南令。所謂「糗糧」即指乾糧，<sup>85</sup>「檣」即檣、桅桿。這段引文是說，「送窮」時需用柳枝條編成柳車，以草紮成草船，並備上乾糧。牛已繫在柳車輓下，帆已張掛上了草船桅桿。一切準備妥當後，就開始禮送「窮鬼」。主人三揖「窮鬼」，勸說他快速離去。此番場景之描述，當係韓愈親身經歷或基於見聞而撰，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送窮」之習俗。

柳車又稱「送窮車」，此語頻見於宋元士人筆下。北宋詩人唐庚(1070-1120)撰〈兒曹送窮以詩留之〉云：「世中貧富兩浮雲，已著居陶比在陳。就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柳車作別非吾意，竹馬論交只汝親。前此半癡今五十，欲將知命付何人。」<sup>86</sup>南宋趙孟堅(1199-1295)撰〈上安吉使君黃寺丞狀〉云：「今者趁承工夫，則淺惟精鑒之，洞物豈常程之。取材縛柳為車，且送窮鬼。」<sup>87</sup>金代李遜(約 1208 前後在世)作〈送窮〉詩曰：「昔年曾作送窮詩，結柳齋糧擬退之。送去還來還復語，君家猶有讀書兒。」<sup>88</sup>元代張雨所撰〈除夜〉詩中亦有「自緣身懶惰，莫遣送窮車」之句。顯而易見，上述詩文均承襲了韓愈「結柳作車」送窮鬼的說法。

這一說法亦為明清文人所採納。明代倪元璐(1593-1644)撰〈視學及士

<sup>84</sup> 韓愈(唐)，〈送窮文〉，載《韓昌黎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卷 36，頁 8；韓愈(唐)，〈送窮文〉，載氏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第 8 卷，頁 570。

<sup>85</sup> 據《史記·魯周公世家》云：「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司馬遷(西漢)，《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3，頁 1524)《後漢書·隗囂傳》載：「(建武)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糧，恚憤而死。」(范曄(南朝宋)，李賢(唐)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13，頁 531)又《舊唐書》卷 133《李晟傳》：「懷光卒不悟，軍眾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為晟所襲。」(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 133，頁 3666)；卷 136，〈齊映傳〉：「(齊)映奏曰：『戎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調陞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同上書，頁 3751)等均見「糗糧」之語，均指乾糧。

<sup>86</sup> 唐庚(北宋)，《眉山詩集》，卷 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4 冊，集部六三，別集類，總頁 312。

<sup>87</sup> 趙孟堅(南宋)，《彝齋文編》，卷 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1 冊，集部一二〇，別集類，總頁 345。

<sup>88</sup> 元好問(金)編，《中州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卷 5，頁 254。

習文體策》有云：「蚤虱之狩者，蓼盤陳而乞化，柳車結以送窮。」<sup>89</sup>前引明人李曄撰〈守歲〉詩曰：「送窮車縛柳，報喜燭生花。」<sup>90</sup>清人朱彝尊（1629-1709）所作〈送窮日作〉詩云：「吾家五窮鬼，四世推不去。今晨縛車船，送往河隄住。」<sup>91</sup>上述引文均談到「送窮」時「縛車船」以送行。

「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就是提供兩種交通工具：柳車、草船。對「窮鬼」而言，無論是選擇走水路（草船），抑或走旱道（柳車），均可獲便捷出行。此外，主人還細心地為他備好了旅途所需的乾糧。這些都是為了讓「窮鬼」盡快離開，從而使主家擺脫貧窮。

### （三）送窮船

前引韓愈〈送窮文〉中言「縛草為船」、「引帆上檣」，乃指「送窮」之船，後人徑稱「送窮船」。段成式撰〈送窮文〉云：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船。判筒而槽，比籜而閭，細帛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酌地歌舞。窮，予謂曰云云。<sup>92</sup>

段氏並未提及「送窮車」（柳車），卻著重描述了「送窮船」：劈分竹筒而為槽，排列筍殼而為門，細麻布捆紮楮錢，粉飾木偶人（即代表「窮鬼」）。「送窮」儀式開始前，「家督」（即家中長子）手執酒水，灑酒於地，載歌載舞，藉此祭祀「窮鬼」。

「送窮船」作為抒情題材而屢見於宋元詩文中。北宋名臣宋庠（996-1066）五言詩〈貧病〉云：「因聲謝才鬼，擬作送窮船。」<sup>93</sup>元代文學家曹伯啟（1255-1333）撰

<sup>89</sup> 倪元璐（明），《倪文貞集》，卷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7冊，集部二三六，別集類，總頁62。

<sup>90</sup> 李曄（明），《草閣詩集》，卷3，總頁30。

<sup>91</sup> 朱彝尊（清），《曝書亭集》，卷19，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7冊，集部二五六，別集類，總頁609。

<sup>92</sup> 姚鉉（宋）編，《唐文粹》，卷33上，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3冊，集部二八二，總集類，總頁486。

<sup>93</sup> 宋庠（北宋），《元憲集》，卷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7冊，集部二六，別集類，總頁440。

〈和孟子周僉司除夜見示〉詩云：「想見來春風景好，奴星又繫送窮船。」<sup>94</sup>

明清詩歌中也常見「送窮船」之說。明初詩人湯式撰〈姑蘇感懷二首〉（之一）云：「猶兀自垂楊路邊，斷橋前面，都纜著送窮船。」<sup>95</sup>清人朱彝尊撰七言詩〈首依韻奉酬〉云：「玉桂國中來底事，開春同縛送窮船。」<sup>96</sup>這裏也提到「送窮船」之說法。

若就材質而論，歷代文獻中所見「送窮船」凡計有如下幾種類型：草船、木船、芭蕉船、紙船。

## 1、草船

韓愈〈送窮文〉所言「縛草為船」證明當時所用「送窮船」乃係草船。元好問〈遺山集〉卷十一〈送窮〉七言絕句中「主人不倦奴星倦，辛苦年年縛草船」<sup>97</sup>之句則再次揭示了韓愈以草船「送窮」。此外，清代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引《江西志書》「萬載縣」條載：「正月三日晚，結草為船，乘載飯糰、肉片、蔬果物類，盛備鼓吹，導引江流，謂之『送窮』。」<sup>98</sup>文中「結草為船」四字表明當地仍以編紮草船來「送窮」。這種做法，無疑承繼了唐代韓愈的舊時傳統。

## 2、木船：竹船、柳船

段成式〈送窮文〉有言：「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船。判筒而槽，比篲而閣，細帛纏幅楮飾木偶。」<sup>99</sup>這段文字表明段氏「送窮船」當為竹木之類。元好問《遺山集》卷十二〈送窮〉（其二）寫道：「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

<sup>94</sup> 曹伯啟（元），《曹文貞公詩集》，卷 6，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2 冊，集部一四一，別集類，總頁 505。

<sup>95</sup>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下冊，頁 1591。

<sup>96</sup> 朱彝尊（清），《曝書亭集》，卷 1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7 冊，集部二五六，別集類，總頁 548。

<sup>97</sup> 元好問（金），《遺山集》，卷 11，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1 冊，集部一三〇，別集類，總頁 127；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 11，頁 276。

<sup>98</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孟春部〉，頁 1889。

<sup>99</sup> 姚鉉（宋）編，《唐文粹》，卷 33 上，總頁 486。

但愧苦無相贈物，柳船輕似去年時。」<sup>100</sup>可見，元氏詩中所述「送窮」之船乃係柳船。這裏所言的「送窮船」，無論竹質抑或柳質，均可歸於木船之類。

### 3、芭蕉船

陳元靚撰《歲時廣記》卷十三「送窮鬼」條引宋人楊湜撰《古今詞話》云：

太學有士人長於滑稽，正月晦日，以芭蕉船送窮作〈臨江仙〉，極有理致。其詞曰：「莫恠錢神容易致，錢神儘是愚夫。為何此鬼卻相於？只由頻展義，長是泣窮途。韓氏有文曾餞汝，臨行慎莫躊躇。青燈雙點照平湖。蕉船從此逝，相共送陶朱。」予幼時亦聞巴談〈送窮鬼〉詞曰：「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輝，內裏更有筵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吃莫形跡。每年只有今日日，願我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sup>101</sup>

引文所述宋人巴談及太學士人均以芭蕉船上點明燈「送窮」。然據常理推斷，此當僅限於南方盛產芭蕉樹之地域流傳。

### 4、紙船

除了上述質地外，「送窮船」還常見一種簡單形式—紙船。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獲嘉縣志》記載：「『上元』……喧鼓樂於中庭，曰『趁鬼』，或作紙船，以酒酹之，投水中任其漂泊，曰『送窮船』。」<sup>102</sup>據此可見，河南獲嘉縣民眾乃是以紙船來「送窮」。

由於「送窮船」與「送瘟船」在形制、功用及儀式內涵上都十分接近，故而民眾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sup>103</sup>南宋陸遊撰五言詩〈門外野望〉中「僧唄家禪瘦，

<sup>100</sup> 元好問（金），《遺山集》，卷 12，總頁 142；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 12，頁 306。

<sup>101</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885 冊，史部·時令類，總頁 242-243；陳元靚（南宋），《歲時廣記》，卷 13，頁 135-136；清代劉喜海跋抄本《歲時廣記》（四十二卷），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庫，書號：13186。

<sup>102</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頁 62。

<sup>103</sup> 「送瘟船」習俗，迄今仍盛行於閩臺地區。有關台灣「送王船」習俗（「王醮」科儀）之研究，詳見李豐楙，〈東港王船和瘟與送王習俗之研究〉，《東方宗教研究》，新 3 期（臺北市：文殊，1993.10），頁 229-265；〈嚴肅與遊戲：從蠟祭到迎王祭的「非常」觀察〉，《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臺北

神船社送窮」<sup>104</sup>之句其實已將「送瘟」與「送窮」聯袂並稱了。此外，《古今圖書集成》引《湖廣志書》「大冶縣」條云：

五月十八日送瘟，紙作龍舟長數丈，上為三閭大夫像，人物數十，皆衣錦繡彩繪，冠佩器用，間以銀錫，費近百金，送至青龍堤燔之，其盛他處罕比。昔人沿『送窮』之遺制，船以茅，故至今猶謂之茅船，而實則侈矣。<sup>105</sup>

這裏明確談到當地流行的「送瘟船」習俗乃係沿襲古時「送窮」舊制，由於「送窮船」是用茅草編成（亦即草船），故時人沿襲之將「瘟船」也稱為「茅船」，只不過尤為奢侈豪華而已。其實，「送瘟」儀式乃欲送走「瘟鬼」，「送窮」儀式則要送走「窮鬼」，而這二鬼卻同為顓頊之子，<sup>106</sup>普通民眾將其混淆也是不難理解的。故《古今圖書集成》引〈武陵競渡略·競渡考〉介紹武陵地區（今湘西北常德市武陵縣）龍舟競渡「送瘟船」之情況後，又補充談道：「爾時，民間設醮預壓火災或有疾患，皆為紙船，如其所屬龍船之色，於水次燒之。此本韓愈送窮，具車與船之意，亦非苟作。」<sup>107</sup>

---

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 135-172；〈迎王與送王：頭人與社民的儀式表演——以屏東東港、台南西港為主的考察〉，《民俗曲藝》，第 129 期（臺北市：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1.1），頁 1-42；〈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與分歧〉，收入《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4），頁 373-422；李豐楙、李秀娥、謝宗榮、謝聰輝等，《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此外，筆者亦就中國古代的「送瘟船」習俗及今台灣所見「王醮」科儀撰寫論文數篇：〈傳承與衍變——從明代《武陵競渡略》檢視閩台「送王船」習俗的歷史傳統〉，待刊；〈祀瘟神與「送瘟船」——中國古代瘟疫醮之緣起〉，待刊；〈宋代遣瘟送船儀之研究〉，待刊。

<sup>104</sup> 陸遊（南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卷 49，頁 2973。

<sup>105</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三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四九卷〈仲夏部〉，頁 2220。

<sup>106</sup> 隋代杜公瞻註《荆楚歲時記》「晦日送窮」條時引《金谷園記》所言：「窮鬼」乃係顓頊（高陽氏）之子，亦名「窮子」。而早在漢代開始，民間就盛傳顓頊子死後化為「疫鬼」的說法，漢代緯書《禮稽命徵》載：「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魃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小兒，為小鬼。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楯，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儼以索室，而驅疫鬼，以桃弧、葉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中冊，頁 512）這一說法，亦為東漢王充（27-約 97）撰《論衡》和蔡邕（132-192）撰《獨斷》所援引和採納。若考察二說之緣起，「窮鬼」之說顯係晚出，不排除乃係脫胎於「疫鬼」說。

<sup>107</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51 卷，〈端午部〉，頁 2236。



#### （四）送擲偶人於戶外

「送窮」的中心議題就是想方設法將「窮鬼」送走，而「窮鬼」多以人形物代替，常見者計有芻人（草人）、木人、紙人等。

##### 1、芻人（草人）

據宋人董道《廣川畫跋》（卷三）對唐代畫家陳惟岳〈送窮圖〉的有關描述可知，圖中「窮鬼」乃係女形芻人——其畫窮女，形露醜淒，作踰□態，束芻人立，曳薪船行，繩引□鞞，颿繫柂□，裏以纏繞，薦之醖醢，周偏室居，開門送之。」<sup>108</sup>而與「窮女」形成鮮明對照的「富女」則係「鏤木」而成——「又為富女，作嫵媚象，裁槻為衣，鏤木為質，戴之舩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導卻行。」陳氏創作〈送窮圖〉當是對昔時民眾生活的真實再現，故可推知至遲晚唐時就已形成了以草人扮作「窮鬼」的風俗。

「束芻為人」以「送窮」的做法，亦見載於清代方志中。如清代《古今圖書集成》引《江西志書》「瑞州府」條載：「正月三日夜深，束芻像人，剪綵紙為衣。巫祝呪禳，送河邊焚化，投水中。其小家執杖、鳴鑼鼓，謹譟擊驅鬼出門，疑即古儺遺意也。」<sup>109</sup>同治本《瑞州府志》（卷二）所載亦大略相同（見前引）。<sup>110</sup>上述二書均言瑞州府民眾「送窮」時「束芻像人」也就是捆紮草人（但未言明性別），並配合燃放爆竹及敲鑼打鼓，將草人送至河邊漂走，藉此驅逐「窮鬼」離境。此外，同治本《河曲縣志》亦載「送窮」時須「焚香燃爆」，如謂：「（正月）初五日，俗謂之『破五』。黎明，掃室中塵土汙穢送於巷口，焚香燃爆，名曰『送窮』。」<sup>111</sup>鳴鑼、燃爆，其用意無非就是將窮鬼從家宅中驅趕出去。

<sup>108</sup> 董道（宋），《廣川畫跋》，卷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3冊，子部一一九，藝術類，總頁468。

<sup>109</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3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15卷，〈孟春部〉，頁1889。

<sup>110</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頁1104。

<sup>111</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566。

## 2、木人

段成式〈送窮文〉云：「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船。判筒而槽，比簪而閤，細泉纏幅楮飾木偶。」<sup>112</sup>由此可知，「窮鬼」乃係由粉飾過的木質偶人來代表。這偶人應當放置於「送窮船」上，待儀式過後、送入河中，任其漂泊而去。

## 3、紙人

相較於代表「窮鬼」的芻人和木人，「剪紙為人」則更常見於明清兩代。誠如前引韓邦靖《朝邑縣志》卷一〈風俗〉云：「（正月）五日以故綵紙為婦人，戊夜乃出婦人送窮。」<sup>113</sup>可見，明代朝邑縣民眾就盛行剪綵紙為婦人形狀，擇正月初五傍晚時分送出宅外，以示「送窮」。

清人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引《山西志書》「朔州」條載：「正月五日，俗稱『破五』，以彩紙剪作裙衫，裝女子形，於五更送之街頭，曰『送窮媳婦出門』。」<sup>114</sup>引文描述了朔州民眾剪綵紙作裙衫、扮作女人狀，擇「破五」日黎明時分送至街頭，俗稱「送窮媳婦出門」。該書又引「陽曲縣」條云：「正月五日，婦女以色紙裝男女形。」<sup>115</sup>這裏談到每年正月初五，陽曲縣婦人剪綵紙為男、女人形。文中雖未交待其用途，想必應該也是為「送窮」所造吧。此外，清人彭兆蓀〈樓煩風土詞六首〉（之二）自註云：「正月五日，剪紙為婦人，棄路衢，曰『送窮』。」前引康熙本《解州志》亦談到「送窮」乃「縛紙婦人」狀。雍正年纂修《陝西通志》卷四五〈風俗〉引《臨潼縣志》、道光十六年重刻本《咸陽縣志》則均並未點明紙人之性別和形貌，僅籠統地說：剪紙人送擲門外，謂之「送窮」。總之，上述文獻清楚地表明清代山西、陝西等地乃採用剪紙人「送窮」的形式。

<sup>112</sup> 姚鉉（宋）編，《唐文粹》，卷 33 上，總頁 486。

<sup>113</sup> 韓邦靖（明），《朝邑縣志》，卷 1，總頁 52。

<sup>114</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孟春部〉，頁 1887。

<sup>115</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孟春部〉，頁 1887。

有趣的是，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張北縣志》記載：「『破五』：正月初五日，俗謂之破五。各家用紙製造婦人，身背紙袋，將屋內穢土掃置袋內，送門外燃炮炸之，俗謂之『送五窮』。亦有兒童高喊唱歌者。」<sup>116</sup>據引文可知，民國時張北縣（今屬河北張家口市）民眾於正月初五「破五」日「送窮」，每家用紙糊一個婦人偶像、象徵「窮鬼」，身背紙袋子，袋內裝著宅內穢土。把這個紙質婦人送到門外，然後燃放鞭炮炸毀她，謂之「破五窮」。同時，兒童在一旁高喊和唱歌。這幅場景，儼然就像全體家庭成員一起參與的娛樂遊戲，從而使原本莊重、嚴肅的儀式活動變得極富趣味性。

### （五）灑掃庭除

南宋俞德鄰〈斥窮賦〉言：「俞子刈荊，掃室，剪蕉，載糞，委敝裘於道傍，揖窮鬼而三呪」云云。<sup>117</sup>這段文字是說，「送窮」之前須先整肅居室和庭院—「刈荊、掃室、剪蕉」，此舉意在將家中汙穢及晦氣一律清掃出門。隨後，準備乾糧和破舊衣服，送「窮鬼」出行。引文末尾「揖窮鬼而三呪」之句，說明還當設有代表「窮鬼」之偶像，然不知是否為人形狀。

與前述人形物代表「窮鬼」有所不同，部分地區民俗中並未造設偶像，而徑直將灶灰、積塵、敝帚等垃圾視作「窮鬼」。將這些汙穢、不祥等物拋擲出門外（或大路上），也就代表了將「窮鬼」送離出境。陳元靚撰《歲時廣記》卷九「送窮鬼」條引宋人呂原明《歲時雜記》記載：「人日前一日（守誠按：正月初六）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sup>118</sup>這段文字是說，正月初六清掃宅室衛生，收攏塵土、垃圾和敝帚，並以七枚煎餅覆蓋其上，趁著無人時，將其丟棄於大路上。不過，引文尚有幾點深層含義耐人尋味：第一、文中所言正月初六日「掃聚糞帚」是否隱指此前數日（如除夕至初五）不允許清掃

<sup>116</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156。

<sup>117</sup> 俞德鄰（宋末元初），《佩韋齋集》，卷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集部一二八，別集類，總頁57。

<sup>118</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85冊，史部·時令類，總頁211。

衛生？據文獻所見，有些地方民俗從除夕開始至「送窮日」（或初三、初五、初六）數天內禁止掃除，如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徐溝縣志》載：「元旦日（即正月初一），家內不令掃地，至初五日五更，方掃地下塵土，送出門外，名曰『送窮』。」<sup>119</sup>又如前引民國刻本《赤溪縣志》（卷一）談到該地以正月初三為「送窮日」，此前三天不許掃地。第二、文中所言「人未行時」是否特指清晨尚無行人時？前引同治本《河曲縣志》就明確說「送窮」乃擇黎明時分。

那麼，「送窮」時在垃圾上覆蓋「敝帚」（破舊掃帚）和「煎餅」是為何意？其實，這是一種抽象化的表達方式：垃圾代表窮鬼，敝帚代表車船、亦含驅逐之義，煎餅代表乾糧。相對於唐代「送窮」的繁瑣程式：粉飾木偶人—窮鬼，編紮交通工具—柳車、草船，備足行旅輜重—糗糧，宋代《歲時雜記》所描述的「送窮」場景儼然已簡化至極，不過基本要素還得以保留。前引元好問《遺山集》卷十二〈送窮〉詩「煎餅虛拋塢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中「塢」字即「塢」，意指塵土、塵埃。這句詩文是說：道路上到處都是拋擲的煎餅和一堆堆塵埃（垃圾），滿城都是「送窮」後返回的人們。由此可見，元氏描述的金朝漢人「送窮」場景乃秉承了《歲時雜記》中宋人的傳統做法，而明顯不同於唐代韓愈及段成氏所述。宋人以「灑掃庭除」的方式來表現「送窮」，憑借著低廉的製作成本、便捷的行事程式而為民眾廣泛接受，故一直延續到了清代及民國時期。前引《廣東志書》「廣州府」條亦云正月晦日掃除、乃謂「送窮」。<sup>120</sup>又，清人顧祿《清嘉錄》卷一「小年朝」條援引《遠平志》云：「正月三日，人多掃積塵於箕，並加敝帚，委諸歧路以送窮。」<sup>121</sup>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樂城縣志》云：「（正月）五日早，掃堂宇，委土戶外，曰『送五窮』」。<sup>122</sup>這些史料證實了清代部分地區仍以掃除形式來進行「送窮」。

當然，這種做法在後世流傳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細節上的細微變化，同時也

<sup>119</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 543。

<sup>120</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孟春部〉，頁 1890。

<sup>121</sup> 顧祿（清），王邁點校，《清嘉錄》，卷 1，頁 20。

<sup>122</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 128。

彰顯出了地域性特徵。如清嘉慶十五年刻本《澠池縣志》中所言代表「窮鬼」的垃圾並非普通的室內塵埃，而專指「灶灰」，如謂：「（正月）初五日，早出灶灰置之門外，名曰『送窮灰』。」<sup>123</sup>澠池縣，今位於河南西部，隸屬三門峽市。與之毗鄰的偃師縣民眾則視煤渣為「窮鬼」化身，據民國石印本《偃師縣風土志略》記載：「初五日，俗名『破五』。早起，送煤查（渣）於隙地，名曰『送窮』。」<sup>124</sup>與此類似的是，河北邯鄲一帶民眾也將煤碴視為「窮鬼」而送至村外，如民國二十二年（1933）刻本《邯鄲縣志》載：「（正月）五日，俗稱『破五』。未明，以籬頭盛煤碴少許送村外，回時換為黃土，名曰『送窮土、取富土』。」<sup>125</sup>陝西南鄭縣民眾也在「窮日」那天拋擲灰塵和爐渣，據民國刻本《續修南鄭縣志》記載：「（正月）五日，掃除門庭塵積炮滓，棄之通衢，亦韓退之『送五窮』故事也。」<sup>126</sup>

又，清康熙二年修纂《乳源縣志》（卷八）所載「送窮」時已將舊日的「煎餅」代之以紙錢，再配以糕餅、桔子等供品：「（正月）初三日掃門庭，以其敝帚置箕，擲紙錢棄之郊地，以『送窮鬼』。婦女以糕餅、桔子相饋。」<sup>127</sup>總的說來，這些做法都是為了適應當地民眾的本土風俗及飲食習慣而做出的調整。

## （六）瀝酒拜街中（酹地歌舞）

酒，作為「送窮」儀式的必備祭品，始見於唐代。韓愈在〈送窮文〉中就談到「主人」為「窮鬼」備下了乾糧和酒，唱讚祝辭云：「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sup>128</sup>。段成式〈送窮文〉亦云：「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酹地歌舞。」<sup>129</sup>這段文字勾勒出主持「送窮」儀式的「家督」（即家中長子）執酒澆地、以歌舞禮敬「窮鬼」的系列動作。無獨有偶，唐代詩人姚合撰〈晦日送窮三

<sup>123</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頁 278。

<sup>124</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頁 285。《偃師縣風土志略》係由民國時人喬竹坡所撰。

<sup>125</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 439。

<sup>126</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頁 146。

<sup>127</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頁 729。

<sup>128</sup> 韓愈（唐），〈送窮文〉，載氏著《韓昌黎集》，卷 36，頁 8；韓愈（唐），〈送窮文〉，載氏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第 8 卷，頁 570。

<sup>129</sup> 姚鉉（宋）編，《唐文粹》，總頁 486。

首〉(其一)云：「年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sup>130</sup>文中「瀝」字與段氏〈送窮文〉中「酹」字含義相同，均指把酒澆在地上。姚氏詩云「瀝酒拜街中」就是說「送窮」時乃灑酒於地，以示禮敬，同時兼含訣別之義。

宋人所作〈送窮〉詩文中亦見「瀝酒」之舉。如北宋王令〈送窮文〉云：「維皇祐壬辰十二月三十日，謹奉香酒，送窮鬼而告之曰」云云。<sup>131</sup>這篇祭文開篇就談道：恭敬地奉上美酒、禮送「窮鬼」出行。又如，北宋詩人張耒(1054-1114)撰〈送窮〉詩云：「年年瀝酒拜清晨，風俗新正競逐貧。不用為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sup>132</sup>這首七言詩文透露出：作者每年都會在「窮日」清晨時灑酒祭拜「窮鬼」。

#### 四、「送窮」禁忌

除了上述習俗外，「送窮」的諸多禁忌事項也值得關注。這些禁忌涉及出行、飲食、時辰選擇及執行者。下面，我們對此予以分類討論。

##### (一) 出行禁忌：「窮日」不出境、不出門

清人汪森(1653-1726)撰《粵西文載》卷六六〈名宦傳〉中收錄「余孟學」條記載：「余孟學，江夏人。萬曆間，知興業縣。廉能卓異，賑恤饑民，和處鄉士，澤及青衿。陞任去民，攀送窮日，不得出境。」<sup>133</sup>這段文字反映出粵西一帶民眾奉行「窮日」出行之禁忌：恰逢此日，官吏即使離職他任，也不得出境。不僅官員如此，普通老百姓也不得在「窮日」出門。如清代雍正年間編纂的《陝西通志》卷四五〈風俗〉引《韓城縣志》云：「(正月)五日忌出門，以新肉置釜中炭火炙之，或以麻豆，名曰『送窮』。」<sup>134</sup>這裏介紹說：「窮日」這天，當地人忌諱出門。

<sup>130</sup> 姚合(唐)，《姚少鑒詩集》，卷6；劉衍，《姚合詩集校考》，卷6，頁85。

<sup>131</sup> 王令(北宋)，〈送窮文〉，載氏著《王令集》，卷19，頁338。

<sup>132</sup> 張耒(北宋)，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30，頁529。

<sup>133</sup> 汪森(清)，《粵西文載》，卷66，載永瑤、紀昀(北宋)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67冊，集部四〇六，總集類，總頁134。

<sup>134</sup> 劉於義(清)監修、沈青崖編纂，《陝西通志》，卷4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3冊，史部三一一，地理類，總頁559。

考究其原因，誠如前引《赤溪縣志》（卷一）解釋的那樣：「初三日送窮鬼。……是日男女不出門，恐遇窮鬼，亦俗之迷惑者也。」<sup>135</sup>這段引文是說：赤溪縣（今屬廣東臺山市赤溪鎮）民眾恪守「窮日」不出門的禁忌，僅是因為「恐遇窮鬼」，故而當日閉門不出、藉此避免招惹「窮鬼」纏身。

考究「窮日」出行禁忌之形成，似與「三惡月」說法有關。<sup>136</sup>據南宋清源人莊綽（生卒年不詳）撰《雞肋編》（卷上）記載：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瞻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為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倣為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傢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為『上瓦』，五月為『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為『上瓦』，坤為『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137

這段文字翔實地考證分析了「三惡月」之形成由來，指出：宋代以降，官吏遷調，逢正月、五月、九月這三個月份，則「不肯交印視事」。而「窮日」多為正月某日（如初三、初五、初六），故遷官不出境尚有情可原。

此外，明代謝肇淛撰《五雜俎》卷二〈天部〉記載：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清波雜誌》謂佛法以此三月為齋素月，不宜宰殺，足破俗見。今京師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

<sup>135</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頁 818。

<sup>136</sup> 有關「三惡月」（又稱「三忌月」、「三長齋月」）之形成由來及禁忌習俗，詳見劉淑芳，《「年三月十」——中古後期的斷屠與齋戒》，載氏著《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75-114。

<sup>137</sup> 莊綽（南宋），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0-31。

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sup>138</sup>

此處引文所載大抵承襲了《雞肋編》中「三惡月」之說法。

## （二）飲食禁忌

據各地「送窮」風俗顯示：儀式中除了為「窮鬼」提供車、船等交通工具外，還必須為其備上乾糧，即如南宋陸遊〈新歲〉詩中所描述：「載糗送窮鬼，扶箕迎紫姑。」<sup>139</sup>這些「送窮」的「糗糧」中最常見的是煎餅；或以糕餅、桔子相饋（詳見清康熙本《乳源縣志》卷八）；或以鹽米（見唐代李郢〈正月晦日書事〉）；當然也偶見以多種物類供奉者——「乘載飯糰、肉片、蔬果物類」（如前引《江西志書》「萬載縣」條）。不過，對於民眾而言，「送窮」那天也需遵守一定的飲食禁忌。

### 1、作糜鋪之

文獻所見部分地區民眾在「送窮」那天必須煮粥來喝，此或源於傳說中「窮子」喜好喝粥的緣故吧。前引明人謝肇淛撰《五雜俎》卷二〈天部〉載：「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謂是日天氣常窮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鋪之。」<sup>140</sup>這段文字說明，閩中一帶民眾盛行在「送窮」那天，以糖和棗等物煮粥來喝。

那麼，為何選用「糖」和「棗」這兩種物品呢？我們認為，此或與二物的象徵涵義有關。今人王子今先生指出：「『棗』有『早』的象徵意義。《國語·魯語上》載：『夫婦贊不過棗、栗，以告虔也。』韋昭注：『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脯、脩、棗、栗。』」<sup>141</sup>也就是說，「棗」通「早」，寓意「窮鬼」早早離去。

關於「糖」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的生產和應用，則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

<sup>138</sup> 謝肇淛（明），《五雜俎》卷2，頁53。

<sup>139</sup> 陸遊（南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卷65，頁3685。

<sup>140</sup> 謝肇淛（明），《五雜俎》卷2，頁30-31。

<sup>141</sup>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56。



<sup>142</sup>據季羨林先生考證認為：「中國蔗糖的製造始於三國魏晉南北朝到唐代之間的某一個時代，至少在後魏以前。」<sup>143</sup>唐宋時，蔗糖因產量少而顯得尤為珍貴，除了藥用和祭祀外，多為達官貴人所食用。此後，隨著製糖術的引進提高和甘蔗的廣泛種植，「到了明代，沙糖等早已是家家必備，天天必用，人人必吃了。」<sup>144</sup>而閩中地區則盛產蔗糖，當地百姓日常熬粥時添加蔗糖已不稀見。而「送窮」當天以糖熬粥，其意乃代表了美味和喜慶。<sup>145</sup>

## 2、填五窮

「送窮」之日，每人均須飽食，此謂之「填五窮」。清雍正年間編纂《陝西通志》卷四五〈風俗〉引《臨潼縣志》云：「正月五日，剪紙人送擲門外，謂之『送窮』。」<sup>146</sup>又引《延綏鎮志》云：「五日，飽食謂之『填五窮』。」<sup>147</sup>由此可見，當地民眾在正月初五「送窮」這天，每人都必須飽餐一頓。對於那些終日忍饑挨餓的貧苦百姓而言，吃頓飽飯應該是多麼奢侈和盼望的一件事情啊。「填五窮」這一飲食禁忌，也充分表達出了當地民眾希望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美好願望。

## 3、烏炭壓貯食以避邪

清代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引《四川志書》「茂州」條云：「（正月）五日，俗謂『五鬼日』。凡飲食動用之物，俱於先日晚取出，以足一日之用，其存貯食物皆以烏炭壓之，以為避邪。」<sup>148</sup>這段引文敘述了清初茂州地區（今屬四川阿壩州）民眾在「五鬼日」（正月初五）這天處理家庭餐食上的一些禁忌原則：頭

<sup>142</sup> 有關中國蔗糖（食糖）的發展演變史，詳見李治寰，《中國食糖史稿》（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0）；季羨林，《蔗糖史》（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9）。

<sup>143</sup> 季羨林，《蔗糖史》，頁 57。

<sup>144</sup> 季羨林，《蔗糖史》，頁 285。

<sup>145</sup> 此外，「糖」亦見施用於歲末送灶神的民俗儀禮中。據南宋周密（1232-1298）撰《乾淳歲時記》、清代富察敦崇（1855-1922）撰《燕京歲時記》記載：臘月祭灶神時所用供品是花錫米餌（糖餅）和糖粥等物，意在以糖封口，以免灶王爺上天庭匯報時說壞話。

<sup>146</sup> 劉於義（清）監修、沈青崖編纂，《陝西通志》，卷 4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3 冊，史部三十一，地理類，總頁 559。

<sup>147</sup> 劉於義（清）監修、沈青崖編纂，《陝西通志》，卷 45，總頁 559。

<sup>148</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孟春部〉，頁 1890。

天晚上就得把翌日所需的飲食物品準備妥當，餘下食物均以烏炭壓鎮之、藉此避邪。

### （三）時辰禁忌：「送窮」的時間選擇

有關「送窮」活動的舉行時間，也是一項值得討論的禁忌議題。我們梳理文獻中所見「送窮」之時辰，舉凡計見有三種：白天、傍晚、黎明。這三個時段的不同，也可從側面折射出「送窮」儀式的大致情況：若當地民俗慣於低調「送窮」，則多擇夜晚寂靜無人時；反之，必然會在白晝人跡眾多時分高調進行；而黎明時分「送窮」則二者兼有：既有高調地敲鑼、燃爆之案例，又可見靜悄悄地送走處理。

#### 1、白天

唐代韓愈及段成式所撰〈送窮文〉中所描述的「送窮」儀式及場景，均係白晝時舉行。此外，不少地方志書中所言「送窮」儀式也是在白天進行。這些白天舉行的「送窮」儀式，無一不是大張旗鼓地刻意營造出一種喧鬧、熱烈的氛圍和效果。

#### 2、夜晚

唐代詩人李郢作〈正月晦日書事〉詩云：「詩書奴婢晨占鵬，鹽米妻兒夜送窮。早晚郊原莫零涕，動搖葵麥有春風。」<sup>149</sup>這裏明確談到妻兒以鹽米「送窮」乃於正月晦日之夜晚。這與前引宋人巴談〈送窮鬼〉所言相互吻合——「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詩中「正月月盡夕」五字，已然言明「送窮」的時間乃係正月晦日之傍晚。

此外，明人韓邦靖撰《朝邑縣志》（卷一）：「（正月）五日以故綵紙為婦人，

<sup>149</sup> 蒲積中（宋）編，《歲時雜詠》，卷9，載永瑤、紀昀（宋）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8冊，集部二八七，總集類，總頁279。

戌夜乃出婦人送窮。」<sup>150</sup>文中「戌」當係「戌」字之誤，即戌時（19：00-21：00），亦屬夜晚之範疇。前引《江西志書》「萬載縣」條也談到當地民眾在正月初三的夜晚「送窮」。<sup>151</sup>而至於「晚」為何時，則未言明。又，該書「瑞州府」條也談到當地民眾「送窮」乃係於正月初三之「夜深」。<sup>152</sup>不過，耐人尋味的是，清同治本《瑞州府志》所言「送窮」時間則為「正月三日清晨」，不知是否後來民俗習慣發生了變化？

### 3、黎明

北宋詩人張耒〈送窮〉詩文開篇「年年瀝酒拜清晨，風俗新正競逐貧」<sup>153</sup>之句言明：每年「窮日」清晨時分，詩人都會「瀝酒」拜於街中、以送「窮鬼」。黎明乃是一天之始，此時「送窮」體現了告別舊日、送走貧窮、迎接全新開始的積極心態。清代諸多地方志中，黎明「送窮」之案例為數不少。如前引《河曲縣志》和《瑞州府志》均談到黎明「送窮」時，焚香、燃放爆竹、敲鑼打鼓，藉此達到驅逐「窮鬼」之目的。

與上述熱鬧場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部分地區在黎明「送窮」時則採取低調式處理方式。如前引《山西志書》「朔州」條、康熙本《徐溝縣志》均談到「送窮」乃擇「五更」時（即寅時，3：00-5：00），亦指黎明時分。這一時間段，與康熙本《解州志》所言「寅夜」相吻合。據此可見，清代山西地區（前述朔州、徐溝、解州均屬山西境內）多以清晨寅時（3：00-5：00）施予「送窮」。此外，前引民國刻本《邯鄲縣志》、民國鉛印本《中部縣志》所言「送窮」時間——「未明」，也是指黎明、天尚未大亮之際。

<sup>150</sup> 韓邦靖（明），《朝邑縣志》，卷1，總頁52。

<sup>151</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3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15卷，〈孟春部〉，頁1889。

<sup>152</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3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15卷，〈孟春部〉，頁1889。

<sup>153</sup> 張耒（北宋），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卷30，頁529。

#### （四）行為主體禁忌：「送窮」的執行者

翻檢文獻可知，歷代「送窮」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行為，而非類似於「送瘟船」那樣的公眾性、群體性活動。就「送窮」的執行者而言，不外乎家庭成員中的三類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其實，從「送窮」執行者所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可以準確地反映出儀式之隆重與否及其所受的重視程度。若探尋其規律，可大致歸納為三種情況：「送窮」時若舉行熱鬧、隆重之儀式，多由男人（家長、家督）來主持；若採取低調式拋擲垃圾或偶人等方式，則通常由女人（家中主婦）來承擔；當「送窮」流於戲噱時，便由兒童以遊戲的方式來完成。

#### 1、男人

韓愈〈送窮文〉中談到「送窮」儀式的與事者共計有兩位：「主人」（即韓愈）、「奴星」（家奴名星）。「主人」是執行者，扮演了主導性角色；「奴星」則從事輔助性工作，譬如負責事先編製車船，牽牛送「窮鬼」出行等。而整個過程中，似乎並無女性參與。

此外，段成式〈送窮文〉云：「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船。……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酹地歌舞。窮，予謂曰」云云。其中「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酹地歌舞」之句顯示了主持「送窮」儀式的「家督」執酒、以歌舞禮敬「窮鬼」，藉此開場。所謂「家督」就是指家中長子，<sup>154</sup>其在儀式中扮演主持人的角色，即先行烘托和鋪墊。而隨後「窮，予謂曰」（又作「予謂窮曰」）云云，說明段成式作為一家

<sup>154</sup> 據《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司馬遷〔西漢〕，《史記》卷41，頁1753）《江西通志》，卷39《古蹟·吉安府》：「慈孝堂：在府南永和市。《顏子奇記畧》：永和胡氏有母曰黃，子三人，早失所怙，弱而不立。洪武辛未秋，徙富民以實京師，胡氏在焉。母命其子私計之，誰當行者。長者曰：『吾當往。』其次曰：『不可，吾兄家督也，寧可失乎，吾當往。』幼者曰：『二兄相助綜家事，寧可少一乎，吾當往。』兄弟推讓者再四，母徇弟意而遣之行。宗族嘉之，扁其堂曰『慈孝』。」（謝旻〔清〕監修、陶成編纂，《江西通志》，卷39，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4冊，史部二七二，地理類，總頁322）《湖廣通志》，卷47《鄉賢志》引《舊通志》云：「周璫，縉長子。縉謫戍興州，璫為家督，撫諸弟極友愛，鄉黨宗族無間。以子源貴贈監察御史。」（邁柱〔清〕監修、夏力恕編纂，《湖廣通志》，卷47，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3冊，史部二九一（地理類），總頁5）。

之主也參與了祭祀，並負責儀式的重要頭戲——唱讚「送窮文」。而開篇「童稚戲為送窮船」之句，則說明當有其他小孩子參與其中。

此外，南宋俞德鄰〈斥窮賦〉言：「俞子刈荊，掃室，剪蕉，載糗，委敝裘於道傍，揖窮鬼而三呪」云云，<sup>155</sup>也證實了乃係由俞氏本人親自「送窮」。

## 2、女人

唐代詩人李郢〈正月晦日書事〉詩云：「詩書奴婢晨占鵬，鹽米妻兒夜送窮。」<sup>156</sup>詩文談道：「送窮」乃係由詩人的妻兒（當以妻為主），攜帶鹽和米，於夜間完成。這裏，男主人是不出現的。而此時「送窮」儀式顯然也不同於韓愈所言備齊車船和糗糧、「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那樣繁瑣，而當屬於宅外拋擲紙人或傾倒垃圾之類的祭奠行為。

無獨有偶，清康熙二年修纂《乳源縣志》（卷八）亦談道：「正月初三送窮鬼，婦人清掃門庭、擲紙錢，並以糗餅、桔子相饋。」又，民國刻本《赤溪縣志》（卷一）云：「婦人待正月初三早起掃除宅室，攜香紙、送垃圾於路旁，謂之『送窮鬼』」。這些都說明，女性（家中主婦）扮演了「送窮」時的重要執行者角色。

## 3、兒童

某些地方民俗中，「送窮」則由小孩獨自來完成。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大同府志》記載：「（正月）五日，剪采紙為人，小兒擁抱戲通衢，曰『送窮』；有攫而去者，曰『得富』。」<sup>157</sup>這段文字是說：大同府民眾於正月初五那天，剪綵紙為人形，由家中小兒抱到大路上玩耍，稱為「送窮」。有的孩子將紙人搶攫而去，謂之「得福」。

<sup>155</sup> 俞德鄰（宋末元初），《佩韋齋集》，卷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集部一二八，別集類，總頁57。

<sup>156</sup> 蒲積中（宋）編，《歲時雜詠》，卷9，總頁279。

<sup>157</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545。

### （五）〈送窮文〉——「送窮」時所念之咒語？

唱讚「送窮文」是整場「送窮」儀式的重頭戲，通常於一家之主來擔任。這一點，從韓愈及段成式〈送窮文〉中即可得到明證。今人康保成先生認為：「韓文、段文均記主人（予）對『窮鬼』所言，實在是對民間送窮時所念咒辭祝語的改造而已。」<sup>158</sup>筆者讚同這一觀點。但凡民眾「送窮」時口中通常會念念有詞，所念者多係口語化的咒語或通俗化的送客辭之類，大意是表達希望「窮鬼」趕快離開、永遠不要再回來。但是，文人士大夫當然不肯自貶身份、將自己等同於普通老百姓，他們要顯示出自己的才華修養和文學造詣，基於此而撰寫了為數不少的〈送窮文〉來替代咒語。這一點，從南宋俞德鄰〈斥窮賦〉開篇之句便可得到證實，其謂：「俞子刈荊，掃室，剪蕉，載糗，委敝裘於道傍，揖窮鬼而三呪」云云。<sup>159</sup>文中「揖窮鬼而三呪」之後，接續的就該是已被文學化改造的呪辭咒語。又如明代劉基（1311-1375）撰〈送窮文〉更似一篇典型的道家祝咒文辭，如謂：

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嗟爾窮鬼兮，無上天！……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嗟爾窮鬼兮，無潛於山！……嗟爾窮鬼兮，無入於水！……  
汝不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sup>160</sup>

這篇文章通篇談論驅逐「窮鬼」遠離居所、城池、天地、山水，文末尾句更以恐嚇和命令的語氣對「窮鬼」說道：「汝不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這已然就是道家律文的標準化用語了。總之，這篇〈送窮文〉較之同類宗教科儀祝文，更富有文采，亦不失道門儀範。

這些「送窮」作品中，部分佳作得以流傳後世。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歷代所

<sup>158</sup> 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攤祀灶風俗〉，《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頁111。

<sup>159</sup> 俞德鄰（宋末元初），《佩韋齋集》，卷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集部一二八，別集類，總頁57。

<sup>160</sup> 劉基（明），《誠意伯文集（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8，頁200。又見劉基（明），林家驪點校，《劉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8，頁156-157。

涉「送窮」之文學作品計有：

| 編號  | 作者           | 朝代 | 生卒年       | 「送窮」作品      | 資料出處                       |
|-----|--------------|----|-----------|-------------|----------------------------|
| 1.  | 揚雄           | 西漢 | 前 53-18   | 〈逐貧賦〉       | 《全漢賦》                      |
| 2.  | 韓愈           | 唐代 | 768-824   | 〈送窮文〉       | 《韓昌黎集》卷 36                 |
| 3.  | 姚合           | 唐代 | 779-846   | 〈晦日送窮三首〉    | 《姚少鑒詩集》卷 6                 |
| 4.  | 段成式          | 唐代 | 約 803-863 | 〈留窮辭〉、〈送窮文〉 | 宋姚鉉編《唐文粹》卷 33 上            |
| 5.  | 李郢           | 唐代 |           | 〈正月晦日書事〉    | 宋代蒲積中編《歲時雜詠》卷 9            |
| 6.  | 王令           | 北宋 | 1032-1059 | 〈送窮文〉       | 《王令集》卷 19                  |
| 7.  | 呂南公          | 北宋 | 1047-1086 | 〈窮鬼〉        | 《灌園集》卷 3                   |
| 8.  | 唐庚           | 北宋 | 1070-1120 | 〈兒曹送窮以詩留之〉  | 《眉山詩集》卷 5                  |
| 9.  | 巴談           | 宋代 |           | 〈送窮鬼〉       | 陳元靚《歲時廣記》卷 13 引宋人楊湜撰《古今詞話》 |
| 10. | 佚名<br>(太學士人) | 宋代 |           | 〈臨江仙〉       | 陳元靚《歲時廣記》卷 13 引宋人楊湜撰《古今詞話》 |
| 11. | 呂南公          | 北宋 | 1047-1086 | 〈窮鬼〉        | 《灌園集》卷 3                   |

|     |     |    |           |                 |                |
|-----|-----|----|-----------|-----------------|----------------|
| 12. | 張耒  | 北宋 | 1054-1114 | 〈送窮〉            | 《柯山集》卷 24      |
| 13. | 王之望 | 南宋 | 1102-1170 | 〈留窮文〉           | 《漢濱集》卷 16      |
| 14. | 崔敦禮 | 南宋 |           | 〈留窮文〉           | 《宮教集》卷 12      |
| 15. | 俞德鄰 | 南宋 | ? -1293   | 〈斥窮賦〉           | 《佩韋齋集》卷 8      |
| 16. | 李迥  | 金代 |           | 〈送窮〉            | 元好問編《中州集》卷 5   |
| 17. | 元好問 | 金末 | 1190-1257 | 〈送窮〉（詩三首）       | 《遺山集》卷 11、卷 12 |
| 18. | 郝經  | 元代 | 1223-1275 | 〈邀窮文〉           | 《陵川集》卷 20      |
| 19. | 王旭  | 元代 |           | 〈五窮序〉           | 《蘭軒集》卷 11      |
| 20. | 張雨  | 元代 |           | 〈除夜〉            | 《句曲外史集》卷上      |
| 21. | 劉基  | 明代 | 1311-1375 | 〈送窮文〉           | 《誠意伯文集》卷 8     |
| 22. | 桑悅  | 明代 | 1447-1503 | 〈留窮文〉           | 《桑悅集》卷 3       |
| 23. | 謝榛  | 明代 | 1495-1575 | 〈留窮詩〉           | 《四溟詩話》卷 4      |
| 24. | 彭大翼 | 明代 | 1552-1643 | 〈送窮文〉           | 《山堂肆考》卷 110    |
| 25. | 徐燊  | 明代 | 1570-1645 | 〈送窮乞巧〉          | 《徐氏筆精》卷 6      |
| 26. | 朱彝尊 | 清代 | 1629-1709 | 〈送窮日作〉          | 《曝書亭集》卷 19     |
| 27. | 蒲松齡 | 清代 | 1640-1715 | 〈除日祭窮神文〉、〈窮神答文〉 | 《蒲松齡集》         |
| 28. | 戴名  | 清代 | 1653-1713 | 〈窮鬼傳〉           | 《戴南山先生全集》      |



|     |     |    |           |             |            |
|-----|-----|----|-----------|-------------|------------|
|     | 世   |    |           |             |            |
| 29. | 蔣士銓 | 清代 | 1725-1784 | 〈題周青在〈迎窮圖〉〉 | 《忠雅堂詩集》卷25 |

表格：歷代「送窮」文學作品要目

上述文學作品，多以「送窮」為標題。這些篇目中一部分純屬作者借題發揮，藉此表達情感、暢抒胸懷，彰顯了文人雅趣；而另一部分則係實用文，即為舉行「送窮」儀式時現場宣讀的操作性文本，乃脫胎於宗教祝文。

其實，據有關文獻記載：巫士、道人或直接參與「送窮」儀式。如前引《江西志書》「瑞州府」條云：「正月三日夜深，束芻像人，剪綵紙為衣。巫祝呪禳，送河邊焚化，投水中。」<sup>161</sup>這段引文明確地說：草人（代表「窮鬼」）被送往河邊焚化前，先由巫祝（即民間巫師、道士之流）進行一番呪禁和禳鎮。顯然，這番祝禳任務原本係由家中男主人來完成，此時則改為專業宗教人士來承擔了。

## 五、「迎富」釋義

顧名思義，「迎富」就是指迎祭富神、求得富裕之含義。「迎富」風俗似始於唐代末年。晚唐畫家陳惟岳所作〈送窮圖〉中就繪有「窮女」（草束）和「富女」（木鏤）二位婦人形象。北宋董道撰《廣川畫跋》卷三〈送窮圖〉對此談道：

又為富女，作嫠嫠象，裁槻為衣，鏤木為質，戴之舡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為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sup>162</sup>

這段引文描述了畫中「富女」，婀娜多姿，衣著光鮮，鏤木而成，坐於舟船之上，配飾以纓絡。人們恭立門前迎接之，請她升堂就座、殷勤拜獻，此係「迎富」。董氏又評論說：韓愈作〈送窮文〉時僅知「送窮」，而不知「迎富」，由此證明

<sup>161</sup>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3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15卷，〈孟春部〉，頁1889。

<sup>162</sup> 董道（宋），《廣川畫跋》，卷3，總頁468。

唐代貞元、長慶年間尚未有「迎富」之說。這一推斷，也得到了文獻資料的印證。目前而言，有關「迎富」最早的佐證材料就是唐末韓鄂所撰《歲華紀麗》（卷一）收錄「巢人乞子以得富」條云：「昔巢氏時二月二，乞得人子，歸養之，家便大富。後以此日出野，日採蓬茲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sup>163</sup>這段引文是說，巢氏於二月二日乞得人子而收養之，後家業大富。後人每年擇此日，出郊外採蓬草、放於家門前，以示拜祭，謂之「迎富」。唐宋之際，「迎富」之風遂得大盛於部分地區，乃至演化為民間迎財神的習俗。

### （一）「迎富」之日

「迎富」之日，就是指人們在這天迎接「富神」的到來。與「窮日」頗多類似，「迎富」之日在文獻中也存有分歧。

#### 1、二月初二

唐代「迎富」乃擇二月初二，前引韓鄂《歲華紀麗》（卷一）對此已有明言。北宋龐元英（約 1078 前後在世）撰《文昌雜錄》（卷三）談到唐代節日風俗時說：

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錫；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鷄毬、鏤鷄子、子推蒸餅、錫粥；……。<sup>164</sup>

這段引文印證了唐人「迎富」乃係在二月初二日。

有宋一代，部分地區民眾承襲了唐人「迎富」之傳統。北宋名士樂史(930-1007)撰《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九〈山南東道八·萬州〉介紹該地風俗時云：「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磧上作鷄子蔔，<sup>165</sup>擊小鼓、唱〈竹枝歌〉。二月二日，攜

<sup>163</sup> 韓鄂（唐）撰、錢塘高士奇校，《歲華紀麗》，卷 1，載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第 484 冊，子部·類書，頁 7。

<sup>164</sup> 龐元英（北宋），《文昌雜錄》，卷 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2 冊，子部一六八，雜家類，總頁 668。

<sup>165</sup> 「雞子卜」，又稱「雞卜」，是一種古老的占卜方法，其占法有二：其一曰「雞骨卜」，乃視煮熟祭祀用雞眼骨的孔裂紋形而研判吉凶。據《史記·孝武本紀》：「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唐代張守節《正義》云：「雞卜法用雞一，

酒饌、鼓樂於郊外，飲宴至暮而迴，謂之『迎富』。」<sup>166</sup>南宋詩人喻良能〈二月二日大雪〉詩中自註「送窮窮不去」一句時說道：「俗以正月二十九日送窮，二月二日為迎富。」<sup>167</sup>南宋魏了翁（1178-1237）作詩〈二月二日遂寧北郊迎富故事〉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為貧驅竟難逐，素為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為。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sup>168</sup>這首詩係作者「迎富」當天所作，描述了時人「迎富」場景。據此標題及內文即可判定「迎富」乃在二月二日。總之，宋代「迎富」習俗與唐代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

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此法也。」（司馬遷（西漢），《史記》，卷 12，頁 478）唐代段公路撰《北戶錄》卷 2「雞骨卜」條載：「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傳古法也。」（段公路（唐），《北戶錄》，卷 2，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9 冊，史部三四七，地理類，總頁 45）此外，《古今圖書集成》引《廣東志書》「崖州」條云：「正月三日出獵，先用小雞祭土地，視其骨以占歲之豐歉。柳子厚詩云：『雞骨占年拜水神』。」（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 3 冊，曆象彙編·歲功典，第 15 卷，〈孟春部〉，頁 1890）其二曰「雞卵卜」，即墨畫雞卵、煮熟後視有無蛋黃或蛋白厚薄以驗禍福。唐代段公路撰《北戶錄》卷 2「雞卵卜」條：「邕州之南，有善行禁者，取雞卵墨畫，祝而煮之，剖為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悉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為候。」（段公路（唐），《北戶錄》，卷 2，頁 44）又北宋吳處厚撰《青箱雜記》，卷 3 載：「《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雞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為人所殺，疑屍在潭中，求而弗獲。庶妻何以鑑就岸鑿煮雞子卜之，呪云：『儂來在箇潭裏，他來在別處。』少頃，雞子熟，剖視得儂。韋全曰：『雞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何如也。」（吳處厚（北宋），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3，頁 30）關於這兩種「雞卜」方法，南宋周去非（1135-1189）撰《嶺外代答》均有介紹，該書卷 10「雞卜」條云：「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梃之端，執梃再禱。左骨為儂，儂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梃長寸餘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帝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始記之。」（周去非（南宋），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10，頁 442）

<sup>166</sup> 樂史（北宋），《宋本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149，頁 281。這段文字，亦為明代曹學佺《蜀中廣記》（卷 57）、明代陳耀文《天中記》（卷 4）「迎富」條等典籍所援引。然《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太平寰宇記》則云：「二月三日，攜酒饌、鼓樂於郊外，飲宴至暮而迴，謂之『迎富』」云云，文中「二月三日」當係訛誤所致。（詳見樂史（清），《太平寰宇記》，卷 149，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0 冊，史部二二八，地理類，總頁 407）

<sup>167</sup> 喻良能（宋），《香山集》，卷 6，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1 冊，集部九〇，別集類，總頁 676。

<sup>168</sup> 魏了翁（南宋），《鶴山集》，卷 9，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2 冊，集部一一一，別集類，總頁 141。

此後，「迎富」之舉一直連綿流傳到元及明清。元末明初謝應芳（1296-1392）撰〈二月二日漫興〉七言律詩云：「東風吹散社公雨，紅白花開爛錦雲時。俗喜逢迎富日，老夫羞作送窮文。」<sup>169</sup>詩中所言「迎富日」亦指二月初二。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謝肇淛撰《五雜俎》卷二〈天部〉對「迎富」緣起，談了一些獨到的看法：

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鄰者，鄰家大富，因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為此戲。此訛說也。大凡月盡為窮，月新為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

170

這段引文解釋了「送窮」和「迎富」習俗形成的文化背景，乃係基於「月盡為窮」、「月新為富」的傳統認識，故而世人擇正月晦日「送窮」、二月初二「迎富」。不過，《五雜俎》所載二月初二「迎富」緣起之傳說與前引《歲華紀麗》略有不同：後者於該日收養人子而致富，而本書則擇此日從鄰家「取歸」棄兒。一個是收養，一個是取歸，這一差異或係在流傳過程中訛誤或衍變所致。

清代李光地（1642-1718）等人奉敕修撰《御定月令輯要》卷六「迎富」條：

原《歲華紀麗》：巢人乞子以得富。注：昔巢氏時二月二，乞得人子，歸養之，家便大富。後人以此日出野，採蓬萊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圖經》：宕渠之地，每歲二月二日，郡人從太守出郊，謂之『迎富』。梧州容縣，有迎富亭，亦以二月二日為節。<sup>171</sup>

《圖經》，據日人中村喬推測或係指北宋名士蘇頌（1020-1101）所撰《圖經本草》。<sup>172</sup>而筆者認為，更可能是指明代曹學佺（1573-1646）撰《蜀中廣記》卷五八〈風俗記〉「川北道屬」之「已上保寧」條引《順慶圖經》之類。<sup>173</sup>但無論

<sup>169</sup> 謝應芳（元末明初），《龜巢稿》，卷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8冊，集部一五七，別集類，總頁123。

<sup>170</sup> 謝肇淛（明），《五雜俎》，卷2，頁32。

<sup>171</sup> 李光地（清）等，《御定月令輯要》，卷6，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7冊，史部二二五，時令類，總頁260。

<sup>172</sup> 詳見常建華，《歲時節日裏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65。

<sup>173</sup> 曹學佺（明）撰《蜀中廣記》卷58：「《順慶圖經》云：每歲二月二日，郡人隨太守出郊，謂之迎

怎樣，文中所言「宕渠之地」乃沿用古地名——宕渠郡，<sup>174</sup>係指宋代萬州一帶。明清時的梧州府容縣，古稱容州，今屬廣西玉林市。據前述引文可知：該地清初時尚存「迎富亭」，且以二月初二為節日。

## 2、「送窮」次日「迎富」

北宋初時人趙湘（959-993）撰〈迎富文〉云：「淳化四年，送窮之明日，眾人復迎富。南陽子亦備禮，潔誠將祝之。」云云。<sup>175</sup>與數量眾多的「送窮文」相比，這篇〈迎富文〉無疑是十分罕見的文學作品。作者以文學化語言虛構了「主人」與「富神」之對話，揭示了「迎富」的內涵及心態。引文中「送窮之明日，眾人復迎富」之句點明瞭時人「迎富」乃係於「送窮」之翌日。而作者所說的「送窮」之日到底是指哪天，則不得而知了。

## 3、「送窮」當天即「迎富」

唐末陳惟岳所作〈送窮圖〉中同時繪有「窮女」和「富女」，並展現了「送窮」和「迎富」兩種截然不同的場景——「送窮」時「周偏室居，開門送之」；「迎富」時「主人當戶，反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清人俞樾撰《茶香室三鈔》卷一「正月晦送窮故事」條據《廣川畫跋》中所述〈送窮圖〉場景而認為唐代「送窮」必兼「迎富」。<sup>176</sup>不過，筆者認為這幅畫終究屬於藝術創作，雖然據此可以推斷晚唐時已形成了「送窮」和「迎富」兩種風俗，但無法判定「送窮」與「迎富」乃為同日進行。

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分析，「送窮」與「迎富」同時兼行之做法，當係晚出。

---

富。」（曹學佺（明），《蜀中廣記》，卷 5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1 冊，史部三四九，地理類，總頁 767）。

<sup>174</sup> 宕渠郡，始置於東漢。劉備於建安二十三年（218）分巴西郡置宕渠郡，屬益州。晉時，幾經廢立。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廢宕渠郡，其地置萬州和並州。

<sup>175</sup> 趙湘（北宋），《南陽集》，卷 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 冊，集部二五，別集類，總頁 344。

<sup>176</sup> 《茶香室三鈔》卷 1「正月晦送窮故事」條註云：「按此則『送窮』必兼『迎富』，於事方備。」（俞樾（清），《茶香室三鈔》，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9，卷 1，頁 1100）。

清代詩人彭兆蓀所撰〈樓煩風土詞六首〉之二（詩文見前引）文末自註云：「正月五日，剪紙為婦人，棄路衢，曰『送窮』。行者拾歸，置牢廐間供奉，曰『送窮媳婦去、娶富媳婦歸』。」<sup>177</sup>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大同府志》云：「（正月）五日，剪采紙為人，小兒擁抱戲通衢，曰『送窮』；有攫而去者，曰『得富』。」<sup>178</sup>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刻本《邯鄲縣志》載：「（正月）五日，俗稱『破五』。未明，以籬頭盛煤磧少許送村外，回時換為黃土，名曰『送窮土、取富土』。」<sup>179</sup>這些史料均係出自清代及民國時期，迄今尚未尋覓到較之更早些的佐證材料。

## （二）何為「富神」？

所謂「富神」，亦稱「財神」，乃代表了富裕和財運。「迎富」，就意味著將富裕和財運迎引到家。翻檢文獻可知，「富神」化身計有幾種情況：

### 1、木質婦人

唐人陳惟岳所繪〈送窮圖〉分別勾勒出了「窮女」和「富女」兩位婦人形象。對於「富女」，宋人董道撰《廣川畫跋》卷三〈送窮圖〉這樣描述說：「又為富女，作娉娛象，裁槻為衣，鏤木為質，戴之舡艦，飾以纓絡。」<sup>180</sup>由此可見，這位「富女」乃係木質偶人，身材婀娜多姿，衣著華麗光鮮，坐於舟船之上，配飾以纓絡，儼然一副雍容高雅的造型，從而與「形露醜淒、作跼□態」的草束「窮女」偶人形成了鮮明對比。

### 2、棄子（蓬萊）

韓鄂《歲華紀麗》（卷一）「巢人乞子以得富」條云：「昔巢氏時二月二，乞得人子，歸養之，家便大富。後以此日出野，日採蓬茲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

<sup>177</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集部·別集類，頁530。

<sup>178</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545。

<sup>179</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439。

<sup>180</sup> 董道（宋），《廣川畫跋》，卷3，總頁468。

<sup>181</sup>這段引文是說：後人每年擇此日，出郊外野地採蓬葉以代子，於家門前拜祭之，俗謂「迎富」。顯而易見，這裏所說的「人子」—棄子，也就成了「富神」的化身，他能為收養人帶來好運和財富。而後世民眾則將「蓬葉」（蓬草枝葉）視為棄子，從郊外田野中採摘回來，在家門口祭拜之，藉此求得財運。此舉模仿古時二月初二乞人子歸養而獲富的傳說，表達了人們期盼家業興旺的美好夙願。

### 3、被拾曰富

與晚唐「迎富」時專設「富女」偶像不同，清人已將「窮女」和「富女」簡化為同一紙人。據前引彭兆蓀〈樓煩風土詞六首〉（之二）詩文自註云：「正月五日，剪紙為婦人，棄路衢，曰『送窮』。行者拾歸，置牢廄間供奉，曰『送窮媳婦去，娶富媳婦歸』。」<sup>182</sup>這段註文清楚地表明，當地民眾剪紙為婦人狀，正月初五這天將其丟棄到大路邊，謂之「送窮」；若行人撿拾、拿回家供奉，謂之「娶富媳婦回家」，藉此附喻「迎富」。換言之，窮女、富女乃係一體，同一張剪紙婦人形狀，原創者視之為「窮女」而丟棄，撿拾者則看作「富女」拿回家、供奉在牢廄間（飼養牲口的窩棚）。今人錢鍾書《管錐編》對此評論說：「則此所送之窮即彼所迎之富，一物也，遭棄曰『窮』，被拾曰『富』，見仁見智，呼馬呼牛，可以參正名齊物焉。」<sup>183</sup>此外，前引乾隆本《大同府志》則描述了一幅兒戲場面：正月初五這天用彩紙剪為人形，家中孩童抱著紙人到大街上玩耍，稱為「送窮」；若哪位孩童搶攫了別家紙人，謂之「得富」。

無論是「拾歸」、抑或「攫去」，總之都是將別人的東西收歸己有，這算得上是最原始意義的「得富」。

### 4、黃土

前文已述，部分地區民眾視煤渣為「窮鬼」而在「窮日」那天將其掃地出門。

<sup>181</sup> 韓鄂（唐）撰、錢塘高士奇校，《歲華紀麗》，卷1，頁7。

<sup>182</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92冊，集部·別集類，總頁530。

<sup>183</sup> 錢鍾書，《管錐編》，第3冊，頁962。

有趣的是，民國時期河北邯鄲一帶，則將「黃土」視為「富神」化身而取回家。據民國二十二年（1933）刻本《邯鄲縣志》載：「（正月）五日，俗稱『破五』。未明，以籬頭盛煤碴少許送村外，回時換為黃土，名曰『送窮土、取富土』。」<sup>184</sup>這是說，正月初五黎明時分，百姓用籬筐<sup>185</sup>盛著少量煤碴送出村外，同時換盛一些黃土帶回家，當地人習稱之「送窮土、取富土」。其實，這也是民眾對「送窮」和「迎富」的一種通俗化表現形式。

## 5、五通神

「五通神」，又稱「五聖」、「五顯公」、「五猖神」、「五郎君」，是古代民間信仰中的重要神祇之一。<sup>186</sup>「五通」之說，始見於唐代。舊題柳宗元撰《龍城錄》（又名《河東先生龍城錄》）中「龍城無妖邪之怪」條載：「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憫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sup>187</sup>

唐宋以降，江南民眾多信奉「五通神」，部分鄉村更廣立廟宇、大行淫祀。南宋洪邁撰《夷堅志》多處談到「五通神」，據《夷堅丁志》卷十九「江南木客」條記載：「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腳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sup>188</sup>又《夷堅支癸》卷十「古塔主」條云：「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大禪剎也。所祀五通甚靈異，名為安樂神……無見其形，其聲全如五六歲兒。」<sup>189</sup>世人奉祀「五通神」，不僅有助於經商獲利——「臨川水東小

<sup>184</sup>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頁439。

<sup>185</sup> 「籬筐」是竹篾或柳枝編制的筐式盛器。

<sup>186</sup> 有關「五通神」之研究，詳見馬曠源，〈論「五通神」〉，《（滇）楚雄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雲南：楚雄師範學院，1994），頁24-29；畢旭玲，〈五通神小考〉，《中文自學指導》，第2期（上海：高教育自考專業委員會，2005），頁36-39；彭鵬，〈宋代的五通神信仰初探——《夷堅志》中的五通神〉，《安徽文學》，第9期（合肥：安徽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08），頁186-187。

<sup>187</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丁如明、李宗為、李學穎等校點，《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上冊，頁145。

<sup>188</sup> 洪邁（南宋），何卓點校，《夷堅志》，丁志卷19，頁695。

<sup>189</sup> 洪邁（南宋），何卓點校，《夷堅志》，支志癸卷10，頁1295。



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sup>190</sup>；而且可令人巨富——「吾即五通神……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汨沒風波間。」<sup>191</sup>但若得罪他，則人死財亡——「慶元元年，長子娶官族女，不肯隨羣為邪，當祭時獨不預。旋抱病，與翁姑相機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數里之內，咸有所獲。」<sup>192</sup>

關於「五通神」之靈驗故事，亦多著錄於後世文獻中一如《武林聞見錄》、《情史》、《七修續稿》、《研堂見聞雜記》、《畱青日笥》、《括異志》、《陔餘叢考》、《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郎潛紀聞》、《能改齋漫錄》等書均有徵引和記載。概而言之，廣大民眾將「五通神」視為財富的化身而殷勤祭祀之，無非就是藉此求得財富。

### （三）「迎富」習俗

據諸多跡象表明，其實歷代民間「迎富」風俗遠不及「送窮」那麼興盛。誠如清人錢大昕（1728-1804）撰《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迎富」條所云：「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sup>193</sup>推究其因，筆者認為或係由於廣大勞動人民長期掙扎於饑寒交迫之中，填飽肚子、免遭饑餓，對他們而言已是十分奢望的事情，除此聊無爭取榮華富貴之心。不過，唐宋以降，「迎富」卻也不絕如縷。現將文獻中所見的幾種「迎富」習俗列舉如下：

#### 1、出野採蓬以祭之

據韓鄂撰《歲華紀麗》（卷一）「巢人乞子以得富」條記載：「昔巢氏時二月二，乞得人子，歸養之，家便大富。後以此日出野，日採蓬茲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sup>194</sup>這是說，二月初二這天民眾到郊外田野中採蓬草之葉，攜帶回來，在自

<sup>190</sup> 洪邁（南宋），《夷堅志》，丁志卷 15，「吳二孝感」，頁 667。

<sup>191</sup> 洪邁（南宋），《夷堅志》，丁志卷 13，「孔勞蟲」，頁 648。

<sup>192</sup> 洪邁（南宋），《夷堅志》，支志癸卷 3，「獨腳五通」，頁 1238-1239。

<sup>193</sup> 錢大昕（清），孫顯軍、陳文和點校，《十駕齋養新錄》，卷 16，載氏著《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448。

<sup>194</sup> 韓鄂（唐）撰、錢塘高士奇校，《歲華紀麗》，卷 1，頁 7。

家門前祭拜之。前文已分析了這番舉動的象徵意涵，這裏不再贅述。而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出野採蓬以祭之」作為一種「迎富」民俗，已經滲透到了唐代百姓日常生活中。

## 2、迎富貴果子

北宋龐元英撰《文昌雜錄》（卷三）談到唐代節日風俗時說：「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錫；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饅人；寒食則有假花、鷄毬、饅鷄子、子推蒸餅、餠粥；……」。<sup>195</sup>這段文字羅列了唐代歲時節日之飲食，其中正月二日所備的「迎富貴果子」無疑當係一種點心類食品。這種被稱為「迎富貴果子」的麵食類點心被當作富貴之象徵，而成為唐人二月初二「迎富」時的特定食品。

## 3、郊遊

據文獻資料顯示，北宋時四川地區業已盛行郊外「迎富」的風俗。是時，若干人等結伴郊遊，攜帶飲食和酒水，一路上鼓樂相伴，儼然就是遊山玩水、人情交際。如北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九〈山南東道八·萬州〉云：「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磧上作鷄子蔔，擊小鼓、唱〈竹枝歌〉。二月二日，攜酒饌、鼓樂於郊外，飲宴至暮而迴，謂之『迎富』。」<sup>196</sup>引文中描述，此時「迎富」仿佛讓位給了踏青和飲宴，人們盡情地享受輕鬆和歡鬧，直到日暮才罷休返城，也就是持續了一整天的時間。稍晚一些，南宋魏了翁所撰〈二月二日遂寧北郊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為貧驅竟難逐，素為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我亦為。里俗相傳今已久，漫隨人意看兒嬉。」

<sup>195</sup> 龐元英（北宋），《文昌雜錄》，卷3，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2冊，子部一六八，雜家類，總頁668。

<sup>196</sup> 樂史（北宋），《宋本太平寰宇記》，卷149，頁281。明人陳耀文編《天中記》（卷4）引《太平寰宇記》云：「迎富：蜀萬州風俗……二月二日，攜酒饌、鼓樂於郊外，飲宴至暮而回，謂之『迎富』。」（陳耀文（明），《天中記》，卷4，載永瑤、紀昀（北宋）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65冊，子部二七一，類書類，總頁156）。

<sup>197</sup>據詩文標題可知，作者乃係出城至郊外「迎富」，地點就在「遂寧北郊」（宋代遂寧府，今屬四川省遂寧市，地處四川盆地中部）。文中「簪」即「簪」字，乃指將花朵插戴於髮髻或冠帽上。由此可見，「簪花迎富」當是時人流行的一種風尚。文中「里俗相傳今已久」之句則暗示了此風俗由來已久，這也印證了我們的推斷：郊遊「迎富」風俗之形成，至遲始於北宋。

此外，明代曹學佺撰《蜀中廣記》卷五八〈風俗記〉「川北道屬」之「已上保寧」條引《順慶圖經》云：「每歲二月二日，郡人隨太守出郊，謂之迎富。」<sup>198</sup>文中所言一郡居民跟隨太守出郊「迎富」，這就頗有些官辦意味了，同時也折射出此俗之興盛。

前述引文所涉地域乃係分佈在以萬州、遂寧為中心的巴蜀一帶，而明時秦地民眾（即今陝西地區）亦盛行郊遊「迎富」。據明代謝肇淛撰《五雜俎》卷二〈天部〉載：「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sup>199</sup>此外，這段引文亦見於清雍正年間編纂的《陝西通志》卷四五〈風俗〉引《天祿閣識餘》，二者文字相同。<sup>200</sup>總之，目前來看郊遊「迎富」之風主要盛行於四川和陝西等地區。

#### 4、接路頭

清代，江南一帶盛行「接路頭」風俗，藉此求得廣進財源、出行獲利。如顧祿撰《清嘉錄》卷一「接路頭」條云：「（正月）五日為路頭神誕辰，金鑼爆竹，牲醴畢陳，以爭先為利市，必早起迎之，謂之接路頭。」<sup>201</sup>隨後，顧氏又按曰：

今俗所祀財神曰五路……姑蘇上方山，香火尤盛，號為五聖。……康熙間湯文

<sup>197</sup> 魏了翁（南宋），《鶴山集》，卷9，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2冊，集部一一一，別集類，頁141。

<sup>198</sup> 曹學佺（明），《蜀中廣記》，卷58，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1冊，史部三四九，地理類，總頁767。

<sup>199</sup> 謝肇淛（明），《五雜俎》，卷2，頁32。

<sup>200</sup> 劉於義（清）監修、沈青崖編纂，《陝西通志》，卷45，載永瑤、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3冊，史部三一一，地理類，總頁559。

<sup>201</sup> 顧祿（清），王邁點校，《清嘉錄》，卷1，頁21。

正斌巡撫江蘇，毀上方祠，不復正五顯為五通之所訛，而祀者皆有禁矣。因更其名曰路頭，亦曰財神。予謂今之路頭是五祀中之行神，所謂五路，當是東西南北中耳。<sup>202</sup>

上述引文談道：吳郡民眾每年正月初五（相傳此日為路頭神誕辰）爭相早起，在自家門前，燃放鞭炮，敲鑼打鼓，擺放各種犧牲供品，恭迎「路頭」到來。此風俗乃係由來於舊時「五通神」（即「五顯神」）信仰，後因礙於官方禁淫祀而更名「路頭神」，其神格遂由最初的「行神」轉化為「五路財神」，進而為商業氣息濃鬱的江南民眾所爭相奉祀。

又，清人袁景瀾編撰《吳郡歲華紀麗》卷一「接五路神開市」條亦云：

（正月）初五日，俗稱財神五路誕日。五路者，為五祀中之行神，東西南北中耳。求財者祀之，取無往不利也。故東陽縣俗，於門前具酒饌設祭，謂之賽路神，猶不失本意。今吳俗祭於廳事，參以元壇神，謂神掌天庫之財。是時，連街接巷鼓樂爆竹聲聒耳，人家牲醴畢陳，以爭先為利民市。<sup>203</sup>

這段文字大抵承襲了前引顧氏《清嘉錄》中所言，不過也指出當地民眾祭祀「路頭神」時參雜了「元壇神」（即趙公明）的神格成分。<sup>204</sup>這位玄壇趙元帥亦為財神，將二者合併祭祀倒也符合情理。<sup>205</sup>

<sup>202</sup> 顧祿（清），王邁點校，《清嘉錄》，卷1，頁21-22。

<sup>203</sup> 袁景瀾（清），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卷1，頁23。

<sup>204</sup> 清代台灣各地曾盛行元宵夜炮炸「寒單爺」（又稱「邯鄲爺」）的民間習俗，台灣光復後，除台東外，其餘各地則逐漸廢止了這項活動。而今每年元宵節遊街、炸「寒單爺」，成為台東地區特有的民俗表演。這位「寒單爺」其實就是中路財神（趙公明、玄壇元帥）。上述引文所言清代江南民眾「接路頭」時燃放鞭炮、祭拜路頭神的信仰，乃係參雜了財神趙公明的神格。此外，前引清代《瑞州府志》提及以爆竹鑼鼓送窮逐鬼，民國鉛印本《張北縣志》談到「破五」日燃放鞭炮、炸毀紙質偶人以示「送窮」。這些記載與今台東地區所見炮炸「寒單爺」習俗似存在一定的淵源關係。對此，筆者將另文探討。—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提示

<sup>205</sup> 有關吳地民眾祭祀「元壇神」之情況，顧祿《清嘉錄》也有記載。該書卷3「齋元壇」條：「（三月）十五日為元壇神誕辰，謂神司財，能致人富，故居人多塑像供奉。又謂神回族，不食豬，每祀以燒酒牛肉，俗稱齋元帥。」（顧祿（清），王邁點校，《清嘉錄》，卷3，頁81）。

## 六、結 論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民風習俗差異甚大。就「送窮」個案而言，雖然內涵大抵相同，但表現形式卻多種多樣：有作糜棄破衣祀於巷者；有以柳車草船送窮者；有拋擲偶人於戶外者；有灑掃庭除者；有瀝酒拜街者。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其深層含義均是將「窮鬼」（代表窮運、晦氣）送走，希望從此過上美好生活。這也算是對長期處於飢寒交迫狀態下的廣大勞動人民的一種心靈安慰吧。有鑑於此，「送窮」傳統得以從南北朝及唐代以降一直傳承不絕，時至今日在某些農村地區仍可見此遺風。

翻檢歷代文獻及地方志書，我們發現各地「送窮」之日其實也存在諸多分歧，舉凡計有：除夕、正月初三、正月初五、正月初六、上元節（正月十五日）、正月廿九、正月晦日（正月三十日）。這些日期上的差異，從側面反映出「送窮」習俗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流傳過程中的衍變和調整。

此外，某些地方還盛傳著「送窮」的行為禁忌，諸如出行禁忌、飲食禁忌、時辰禁忌、行為主體禁忌等。所謂「出行禁忌」就是指「送窮」這天盡量不出境、不出門，以免「窮鬼」纏身。「飲食禁忌」乃係指民眾在「送窮」那天用糖棗之類熬粥來喝（「作糜舖之」），或當天必須飽食、謂之「填五窮」。「時辰禁忌」則是選擇哪個時間段（白天、夜晚或凌晨時分）來舉行「送窮」儀式？「行為主體禁忌」就是由哪位家庭成員（男主人、主婦、孩子）來執行辭送「窮鬼」之任務？這些禁忌內容，從多維度展現了「送窮」的文化內涵及地域性特徵。

「迎富」是與「送窮」密切相關的民俗行為，其含義就是迎接「富神」（代表財運、富裕）進門。透過對文獻的梳理和考證，我們認為：「迎富」是在「送窮」習俗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迎富」其實是對「送窮」習俗的補充和深化，二者具有本質上的內在聯繫。這也是為何晚唐陳惟岳繪製〈送窮圖〉時要同時畫出「窮女」、「富女」二位人物的原因。不過，儘管「迎富」風俗早在晚唐時就已形成，但歷代傳播中卻遠不及「送窮」那樣遍

佈大江南北，而基本局限於特定區域（如巴蜀、秦地、江南一帶）流傳。這或許是因為，「送窮」本身就已兼含了「迎富」這一層含義在內。加之，歷代士人階層在恥於言利的心理作祟下，對「迎富」這種赤裸裸地重商、重利的節俗施予打壓或排斥也並不難理解，故而其為商業氣氛濃鬱的部分南方地區民眾所接受，卻始終不見容於北方地區。成大歷史

## 參考書目

### 史料

- 元好問（金），《中州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
- 王令（北宋），《王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去非（南宋），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永瑢、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9 冊，史部三四七，地理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俞樾（清），《茶香室三鈔》，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9。
- 洪邁（南宋），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洪邁（南宋），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袁景瀾（清），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 張耒（北宋），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張岱綴（明），《夜航船》，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2。
- 梁章鉅（清），陳鐵民點校，《浪跡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 莊綽（南宋），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陳元靚（南宋），《歲時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885 冊，史部·時令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陳元靚（南宋），《歲時廣記》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清代劉喜海跋抄本《歲時廣記》（四十二卷），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庫，書號：13186。
- 陳夢雷（清）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5。
- 陸遊（南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揚雄（漢），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葉廷珪（北宋），《海錄碎事》，臺北：新興書局，1969。

蒲松齡（清），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劉基（明），《誠意伯文集（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劉基（明），林家驪點校，《劉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蕭統（南朝梁）編、李善（唐）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錢大昕（清），孫顯軍、陳文和點校，《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謝榛（明），《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謝肇淛（明），《五雜俎》，上海：中華書局，1959。

韓鄂（唐）撰、錢塘高士奇校，《歲華紀麗》，載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484冊，子部·類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韓愈（唐），《韓昌黎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顧瑛輯（元），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草堂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顧祿（清），王邁點校，《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專書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原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原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原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原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上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

季羨林，《蔗糖史》，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9。



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胡樸安編著，《中華全國風俗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

常建華：《歲時節日裏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

劉淑芳，《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錢鍾書，《管錐編》，卷3，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期刊論文

夏日新，〈正月晦日節考〉，《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底5期，頁133-136。

孫津華，〈「窮則獨善其身」——「送窮」節俗與「送窮」系列作品〉，《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105-108。

馬宗昌、張淑玉，〈揚雄《驅貧賦》與漢代民俗〉，《昭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3期，頁17-20。

馬曠源，〈論「五通神」〉，《（滇）楚雄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頁24-29。

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攤、祀灶風俗〉，《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頁110-116。

畢旭玲，〈五通神小考〉，《中文自學指導》2005年第2期，頁36-39。

彭鵬，〈宋代的五通神信仰初探——《夷堅志》中的五通神〉，《安徽文學》2008年第9期，頁186-187。

程伯安，〈元好問與中州民俗〉，《咸寧師專學報》1994年第3期，頁44-48。

劉桂秋，〈唐代的「送窮」習俗〉，載《文史知識》1988年第12期，頁43-45。

譚淑娟，〈孤寂者的自慰與牢騷者自炫——揚雄《逐貧賦》與韓愈《送窮文》比較〉，《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頁143轉封三。

## 附錄：



圖版 1：今人仿繪唐代「送窮」之圖



圖版 2：今人仿繪宋代「迎富」之圖

## Textual Research on 「SongQiong」

Jiang, Shou-Cheng\*

### Abstract

As a kind of folk custom, 「SongQiong」(送窮) began to prevail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or Tang Dynasty. 「SongQiong」(送窮) means seeing out the 「QiongGui」(窮鬼) and seeing in wealthy life, which represented people's nice will of rising up from poverty. Although the connotations of 「SongQiong」(送窮) in different periods were the same, forms of this folk custom in different areas were various, times of 「SongQiong」(送窮) were different and ideas of taboo were not like. Besides, people of some areas carried out 「YingFu」(迎富) as they carried out 「SongQiong」(送窮).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these two kinds of folk custom on their backgrounds, evolution, sacrificial dates and taboo, taking advantage of historical material.

**Keywords:** 「SongQiong」(送窮), 「YingFu」(迎富), 「QiongGui」(窮鬼), Document of 「SongQiong」(送窮), taboo of folk custom

---

\* Vice Researcher, PhD, The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